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

通 讯

第 5 期（总第 339 期）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2018 年 5 月 5 日

-
- ◆ 阔步前进的农业对外合作四十年.....朱丕荣(1)
 - ◆ 改革开放, 改变了中国面貌.....林 干(10)
 - ◆ 学习十九大精神的感想和初步体会.....陈开臻(14)
 - ◆ 纪念农村改革四十周年专题之三.....郭书田(17)
 - ◆ 从农村改革四十年看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陈锡文(20)
 - ◆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八个关键性问题.....韩 俊(26)
 - ◆ 大力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余欣荣(32)
 - ◆ 北京造林绿化工程的真正意义在哪里.....任荣荣(35)
 - ◆ 再论践行“三农”必须强、富、美.....李毓堂(38)
 - ◆ 各方对孙万鹏著灰熵学(灰学)的评议.....吴文上(42)

阔步前进的农业对外合作四十年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朱丕荣

我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当今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口众多，是农产品生产、消费、贸易的大国，在全球农业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农业对外交流与合作将与日俱进、更趋频繁。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的40年来，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对外方针指导下，我国农业对外交流与合作取得了历史性快速发展。1978年时，仅与50多个国家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等少数国际多边机构有联系。目前已与150多个国家和许多国际农业机构与金融组织建立了广泛稳定长期农业合作关系，互动互信，与上百个国家有双边、区域、多边农业合作项目机制。在多边国际舞台上，成为负责任的农业大国，对全球农业治理，有了更多话语权，主导地位日益提升，影响力不断扩大。通过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在农业技术、人才、经济、贸易、文化、外交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深入交流合作，取得互利双赢成效，不仅有利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发展，也促进了国际间友好和谐与农业共同发展，对全球减少贫困，保障粮食安全，改善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作出了有益贡献。

一、农业对外交流合作的发展历程

回顾40年来，农业国际交流与合作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大力开展对外交流，中央与地方农业领导与科技人员有计划地去先进国家考察取经，广开眼界，解放思想，取长补短，更新概念，虚心学习先进经验，并起步对农牧渔业与乡镇企业、农产品加工业积极引进外企业、资金、技术、设备、人才，接受国际援助与贷款。加入世界粮食计划署、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等国际机构，向驻美、法、比、日、澳使馆派农业官员，扩大对外交流局面。第二阶段：从1984年到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积极发展商品生产、重视一、二、三产业综合发展，“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农不稳”，重视引进来为主，更多吸收外资企业直接投资，利用国外贷款，接受国际粮食与技术援助（多边、双边、政府与民间）。从1985年开始走出去，赴非洲合作发展远洋渔业，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入经济全球化。第三阶段：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利用市场经济地位，积极发展农产品国际贸易，农业部参与农产品对外贸易事务。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在农业援外的基础上，扩大境外农业投资合作办企业的步伐。第四阶段：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开创新局面。加强农业对外投资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建设，同时扩大农业援外的力度；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加区域与多边外交活动，由中国主办或在中国召开的多边高层农业与专业会议增多。为适应农业对外合作新形势，国家由农业部牵头有关部委参加，成立农业对外合作联席会议机制，统一规划，统筹协调，政策支持。对驻外使馆增派农业官员，除原有的五国外，新增俄、德、乌克兰、保、阿根廷，加、柬埔寨、缅、墨、非盟使馆，适应农业外交需求。同时逐步向国际农业机构推荐增派中方职员与服务专家。我国承担国际农业机构的会费（两年一次）也有所增加。

上世纪 80 年代，向联合国粮食组织交纳约 500 多万美元，世界粮食计划署 40 万-250 万美元，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 100 万-700 万美元，2016 年则分别交纳 2400 万美元（第 6 位）、1100 万美元（第 29 位）、2167 万美元（第 8 位）。

二、借鉴学习国外农业先进管理经验

1979 年起，我国认真吸收欧美经验，重视农村一、二、三产业综合发展，注意加强农产品产后加工、储存、运销等薄弱环节。一些城市郊区和国营农场企业试办农工商、牧工商、渔工商等联合企业，提高效益。一些地方试办各种农业合作组织，以及企业、基地加合作社、农户、实行产加销结合的产业化经营体系。组织农业机械合作社，向农户提供有偿服务。对农业投资拨款，参照国际合作项目严格管理制度，要有立项的科学依据、目标、设计、论证、评估、可行性调查研究，具体措施进程、审计、监督、验收等程序，力求发挥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对农业科研项目，引入竞争机制，采取合同制，课题要有明确目标、要求、责任，进行论证、评审、核查等程序，以利提高效益、多出快出成果。

学习荷兰、丹麦、德国等开展农民职业教育、对合格农民颁发绿色证书制度的经验，我国加强了对农民进行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教育，有利提高农民素质，推进农村智力开发，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借鉴欧美国开展农业多功能性，推动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业，既满足城市居民改善生活需求，又有利富裕农民、美化农村、密切城乡关系、缩小城乡差别。

参照国外农业法治的经验，国家逐步制定了各种农业专业法规，认真依法实施，保证农业、农村稳定健康发展。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吸取工业化国家的经验，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农业、城市、农村协调发展”，实施以工补农、优惠扶农，扶农补贴；对农村采取“少取、多予、放活”的政策，有力推进农业、农村的发展。

参照 1992 年联合国环境发展首脑会议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 1996 年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保障粮食与食品安全”战略，以及 2016 年“巴黎协定”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国家都相应加强了节约利用资源，保护与改善环境，重视生态安全、生态文明建设、节能提高能效，以及粮食食品安全，抗灾防灾等方面工作，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三、农业对外科技交流合作，推进农业技术进步

农业对外科技交流合作，可以优势互补，推广、创新良种和先进技术，实现农业高产、优质、高效、安全、生态的目标，促进农业技术进步与共同发展。1978 年后，我国认识到科技落后于先进国家 20-30 年的状况，提出“科教兴国”、“科教兴农”的战略。急起直追，加大投入，积极引进良种先进技术、设备与智力人才，合作研究创新等工作，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有了较快提高，1976-1980 年为 27%，2005 年为 48%，2012 年为 54.5%，2017 年为 57.5%，这是引进先进技术起了一定促进作用。

1. 引进良种。40 年来引进农作物种质资源 10 多万份，有的经试验、鉴定、试种成功，直接利用；有的作为育种材料、培育成新良种。目前生产上应用的农作物优良品种，有一半是从国外引进或利用引进种质资源育成的。如抗虫棉、富士苹果、脐橙等大面积推广。还引进一些微生物、食用菌种质资源，以及新的作物如甜叶菊、木豆、籽粒苋，剑麻、香草兰、银合欢、树莓、西洋参、啤酒花、藜麦、辣木等。畜牧方面引进欧美的瘦肉型猪，从欧、澳引进绵羊、奶山羊、波尔山羊，从巴基斯坦引进奶水牛，从欧洲、泰国引进蛋鸡、肉鸡良种，从美洲引进鸵鸟。水产方面，引进罗非鱼、虹鳟鱼、罗氏沼虾、南美白虾、加州鲈鱼、澳洲龙虾、俄罗斯鲟鱼等。

2. 引进先进实用技术。设施农业、塑料薄膜地面复盖、智能温室已经广泛用于蔬菜花卉，经济作物，水稻育秧以及养殖业，可以集约利用耕地，保障稳产高产。2017 年全国设施农业超过 5500 万亩。还引进水稻机械化栽培，免耕法、少耕法、无土栽培、高效低毒农药、生物农药、节水灌溉、测土配方施肥以及机械化养鸡、养猪、养奶牛、人工受精、奶品加工、饲料配方、秸秆氨化、网箱养鱼、飞机播种与防治病虫害、农业遥感技术等先进技术，都在不断推广使用。

3. 引进农业技术装备。利用贷款补偿贸易或技术援助等方式，引进各种农业机械设备和测试仪器，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目前黑龙江垦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已成为农业机械化水平高的农业商品基地。2017 年全国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65%。畜牧方面，引进养鸡、养兔、养猪，奶业生产加工等机械设备。为发展新兴的饲料工业，从 10 多个国家引进 200 多台饲料加工设备。还引进各种农产品加工设备，农业科教单位引进一些先进仪器设备，充实重点试验室，改善科研手段，有利提高科技水平与快出成果。

4. 开展合作研究。采取中外结合，双方投入、共同研究，成果共享，推进科技创新进步。除国家级科教单位外，省地级以上也开展对外合作研究。如与日本合作进行北京市瓜类育种、云南水稻育种、吉林水稻机械化栽培、黑龙江低温冷害防治等；与加拿大进行钾肥施用、油菜品质育种；与法国进行梅山猪、肉牛生产质量安全追溯；与德国进行农村再生能源，农场废弃物处理；与美国进行生物防治、虾病测定、陆地棉基因组测序；与澳大利亚进行小麦育种、反刍动物微量元素，以虫治虫；与意大利进行肉牛育种等项目；与以色列、德国、荷兰、韩国等合作办示范农场。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所属各专业研究所与我国 20 多个省市区的 50 多个科教单位合作课题 200 多个，不少合作研究成果获得国家、部、省级的奖励。

中国农业科学院、热带农业科学院、水产科学研究院及北京农业大学以及一些重点省级农业科教单位，都承担合作研究的任务。以中国农业科学院为例，与 83 个国家的地区，38 个国际组织，7 个跨国公司，美国比尔盖茨基金会等建立合作关系，签订 82 份科技合作协议，与美、加、日、荷、澳、德、英、法、丹麦、巴西、古巴等国科研院所在华共建联合实验室或研究中心 62 个，在巴西、比利时、澳大利亚、古巴和哈萨克斯坦等建立海外联合实验室，拥有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参考实验室 6 个。该院开展的国际合作研究项目达 250 多个，复盖全国 20 多个省市自治区，还组织实施美国比尔盖茨基金会绿色超级稻项目，在亚非 15 个国家示范推广超级稻。国际马铃薯研究中心 2015 年在北京延庆，成立了亚太中心。省级农业科教单位，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例，已与 40 个国家与地区的 153 所大学与科研机构（重点是中亚、俄、埃及、马里、喀麦隆、以色列等国）建立合作关系，开展农业科技教育合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科技教育提供服务。一些外国企业，也在我国不同地区与作物，进行农药、化肥、良种等试验示范推广工作。

5. 人才培养、智力引进。1979 年前，我国农业科技闭关自守，迷信苏联米立林学说，批判摩尔根基因学说，加之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农业科技落后，人才短缺。1979 年后，重视科教兴农，积极引进智力。最先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建立农业科技教育项目，每年组织专家技术人出国考察学习，了解吸收国外科技成就，并有计划地派出懂外语的中年专业人员去先进国家作访问学者，深入进修和合作研究，实地系统学习掌握基础理论和先进技术，填补一些国内空白学科。还建立公派留学项目，逐步派更多的青年人员，出国留学深造。

据 1979—2007 年统计，共向 43 个国家和地区派出访问学者和留学人员 7000 余人，其中访问学者 1800 多人。以后利用公费渠道每年派留学生近千人。不少访问学者和留学生，回国后努力钻研，成为科研教育的骨干力量，有的成为学科带头人或评上了院士。同时还派一些专业技术人员和有文化青年农业职工赴日本、美国、

欧洲一些企业研修实习，回国后，实践中吸收、消化、应用，推进技术进步与生产发展。

此外，采取请进来的办法，有计划地邀请外国专家学者来华讲学咨询指导。为了克服语言上障碍，扩大受教队伍，特邀请一些外籍华裔学者来华系统讲授一些新学科的技术理论知识，尽快缩短我国农业科技与国际上的差距。不完全统计，用专项经费，请进的专家达 1.3 万多人次。1986 年起，农业部率先对一些突出贡献的海外农业专家颁发国际科技合作奖，或授予名誉称呼，以表彰他们的功绩与贡献。

6. 专项引进计划。1994 年 8 月国家设立《引进国际先进农业科技计划》，即 948 计划，投资 18 亿元人民币，从 40 多个国家与地区引进种质资源 2 万多份，高新和实用技术 2000 多项，通过消化吸收创新，加快了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据专家评估，可缩短 10 至 15 年的研究开发时间，节约研究开发经费 30-50%。这是推进农业科技进步的有效举措。

四、引进资金、外企，加快农村综合发展

我国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农业产后储存、加工、运销落后，需要资金投入。改革开放后，积极利用国际贷款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偏重于中西部和贫困地区与国营农场及商品基地，以利农村开发建设，增强农村一、二、三产业综合发展能力，推进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力转移。

1. 利用贷款。主要是世界银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1980 年起，由国家农业委员会牵头，最先利用世界银行贷款。据统计资料：1981-2016 年底止，我国利用世界银行贷款总计 602 亿美元，509 个项目（包括环境交通、城市、农村、能源、水资源、人类发展等领域），其中农业方面有 115 个项目，承诺贷款 112.8 亿美元。占总贷款额的 18.8%，每个项目较大，一般 5000 万以上到 1 亿多美元。有华北平原农业发展，黑龙江农垦，中国橡胶发展，农业部科教二期，种子、淡水养鱼，红壤改良，长江中下游农业开发，农业支持服务，红壤改良二期，饲料工业开发，农垦商业化，沿海资源可持续发展，肉牛发展，新农村生态家园，富民工程等项目，对于推进科教兴农、农业区域综合开发、改造低产田，加强国营农场企业，建立农产品商品基地，都收到良好效益。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贷款：1981-2010 年在中国有 24 个项目，提供贷款 6.36 亿美元，与其他国际机构联合投资还有 5690 万美元，中国政府配套资金 8.93 亿美元，合计总投资 15.8 亿多美元，用于农村边缘贫困地区开发建设，北方草原和畜牧发展、河北农业发展、广东综合养鱼、湖北农村信贷款、四川畜牧发展、山东烟台农业开发、山西农业综合发展、吉林白城低洼地开发、云南思茅农业开发、青海南部开发、江西赣州农业综合开发、皖西、武陵山、秦岭、广西西部、宁夏甘肃南部、新疆、内蒙、大别山区等，有利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产条件与生态环境，发展农村经济。

亚洲开发银行贷款：1987-2015 年，对中国农业与自然资源项目 31 个，共 36.41 亿美元，农业部经营的主要用于农村能源、沼气建设一、二期，旱作农业可持续发展（推广龙头企业加基地农户的产业化模式）3 个项目，总投资 33.62 亿人民币，涉及山东、江西、黑龙江等 7 个省范围，对项目区开发推广农村再生能源，扶持农业产业化发展、保护与改善农村生态环境都起了良好作用。

2. 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开放初期，以“三来一补”（来料、来样、来设备加工、用产品补偿贸易）为主，在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国营农场中兴办，逐步发展独资、合资、合作经营、租赁、融资等企业，并由沿海向中西部扩展。主要来自港、澳门、台地区和韩、日、新加坡、泰国、美国、加、德、英、法等国外商。据商务部统计资料：农林牧渔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1979 年 821 家 6.7 亿美元，2010 年累计 20262 家，492.7 亿美元，2016 年底，达 24652 家（占总的外商 2.85%）1026.8 亿美元（占总的外商投资 2.56%）。

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有利贸工农结合,引进先进设备,了解国际市场行情,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推进农业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现代化,并增加出口创汇能力;外商可以获得盈利,称心满意。

其中,“三来一补”乡镇企业,1984 年有 3500 多家,1988 年 64253 家,2005 年 15.38 万家,从业人员 1804 万人,出口产品交货额 2.066 万亿人民币(包括农畜产品和工业品)。国营农场出口商品 2015 年 822.6 亿元(其中工业 754.7 亿元),2016 年 665.4 亿元(其中工业 624.6 亿元)。

黑龙江洪河农场与日本日棉株式会社合作,利用贷款 1350 万美元,购买引进先进农机设备,开垦 40 万亩耕地,用项目生产大豆(5.5 万吨),分 5 年补偿归还贷款本息。天津市农垦用合作经营方式,与法国合作生产“王朝葡萄酒”;深圳市光明农场与港商合作,扩展奶牛业,牛奶向香港市场销售;广东华侨农场与新加坡商人合作生产油棕和甜叶菊项目,都获得成功。互利双赢,外商获得良好盈利和信誉。

泰国正大集团是个工业化饲料生产大企业,已在我国建立原种鸡场和畜牧养殖场和饲料工业共 400 多家,总投资 1100 亿元人民币,年销售额近 1000 亿元人民币,员工超过 10 万人。重庆三峡集团与美国派森百公司合资,在四川忠县建设全自动鲜橙汁生产线,年加工 23 万吨,成为亚洲最大橙汁生产基地,产品畅销东亚、中东、欧美。

外商投资的种子企业,2012 年有 25 家,如美国孟山都、先锋、瑞士先正达,德国拜耳等,经营蔬菜、花卉、玉米、棉花等良种,在我国市场占有一定地位。

五、利用国际农业援助,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我国于 1971 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与地位,1973 年恢复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合法地位。联合国在 1959 年有决议,要求发达国家每年拿出国民生产总值的 0.7%来援助发展中国家,可通过多边或双边渠道,按项目需求进行定位援助,以利世界平衡共同发展。我国从 1979 年开始,为安置越南侨民回国和湖北、河北发生水灾,开始申请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援助,之后,逐步接受多边和双边的及民间的援助。

1. 粮食援助。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援助从 1979 年开始,有紧急援助和开发性援助。开发性援助,用以工代赈方式,用于贫困缺粮地区劳动积累,搞农田基本建设工程。该署提小麦面粉等实物,发给项目区出工农民,每人、每日 6.5 斤粮食;工具、材料、种苗、运输等费用,由中方作为配套投入。其中大城市奶类项目,对方提供奶粉、黄油,由我方奶牛企业加工成液体奶,出售后收入,用于发展郊区奶牛业,增加奶品供应,缓解市场紧缺。1979-2005 年止,该署在华 76 个项目,提供粮食实物,折合金额达 10 亿多美元,涉及全国 31 个省市,3000 多万农民直接受益。成效显著,获得国际称赞表扬。2006 年起,该署停止对中国援助,中国变为该署的捐赠国、对外援助国。

欧盟奶类项目援助。由于中国奶业落后,城市牛奶供应紧缺,1983 年至 2004 年间,接受欧盟向我提供奶类项目援助,对我国 20 个大中城市和 4 个省区无偿提供五期援助,供给奶粉、黄油和资金设备等,用于发展奶品生产能力,折合金额总计达 10.5 亿元人民币,我方配套资金 17.4 亿元人民币。有力推进我国奶业发展,改善大中城市人民食品消费结构,增加营养供应。

德国(前联邦德国)粮食援助。1988 年 1 月开始,向山东省沂水,沂南、沂源三县,以后扩大到 11 个县市,提供粮食援助,总称“中德合作山东粮援项目”,持续达 10 年之久,用于山区开发、流域治理、农田水利、农村道路、供电网等建设,以及农民培训。1988-1999 年间共向中方提供小麦实物及资金,折合人民币 4.5 亿元,中方配套资金近 6 亿元,总投资达 10 亿元人民币。对促进沂蒙山区综合发展,脱贫致富,起了很大作用,受益人口超过 150 万人。德方评估被誉为“样板工程和模范项目”。

日本粮食增产援助项目。日方向我项目区提供水稻秧机、收割机、化肥、农药、农用汽车等生产资料，促进水稻增产。1983年-2000年共13期，折合总金额94.7亿日元（约7520万美元）。涉及23个省区市的水稻产区的少数重点县，对于受援地区水稻生产机械化和增产水稻，起了示范作用。

2. 技术援助。有多边、双边政府和民间捐赠三个渠道援助。多边主要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开发计划署的技术援助。联合国粮农组织通过技术合作计划和信托基金会计计划和粮食安全特别计划等分别向我国提供技术援助。

技术合作计划的特点是项目小(每个项目援额不超过25万美元)，内容单纯，针对性强，执行快速，硬件与软件结合（硬件不超过一半）起促媒、示范作用，1979年至2017年主项约190个，援额达3000多万美元，内容广泛，包括专项技术开发、农产品保鲜、加工贮藏运销、农业管理培训等。信托基金项目是粮农组织寻找一些发达国家专门资助的技术合作项目，共40多个，总额4000多万美元，内容包括水土保持、治沙、环境监测、灌溉改进、病虫害综合防治，畜牧、渔业、农产品加工、农机、遥感技术、农业统计等。对于加快我国农业科技进步，促进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均有良好作用。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也是援助机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技术的发展援助。对我国的项目，主要用于农业技术开发、教育培训、资源开发示范、项目前活动与技术支持。如西北黄土高原土地资源利用，黑龙江大豆研究，氨化秸秆饲料研究，苏、鲁海水养殖，农机化试验鉴定，农业遥感培训与应用，沼气技术培训中心，蚕桑技术培训中心，淡水养殖培训中心，蔬菜无土栽培研究，甘肃沙漠综合治理等，不仅对我国有益，也为亚太地区其他发展中国家服务，利用培训中心接受发展中国家来华培训。

来自发达国家的双边技术援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项目较多，进入新世纪后逐步减少。如欧盟提供中欧农业技术合作中心，海南橡胶木利用，四川长江上游水土保持等。加拿大提供的奶类、河北养猪，旱地农业钾肥使用、油菜品种改良等。澳大利亚提供的保护性耕作，湖南零陵柑桔研究中心，黑龙江农用飞机，兽医研究所等。日本提供的中日农业研究中心，天津奶类发展等，德国提供的金华奶牛及奶制品加工，南京兔毛纺织等，荷兰提供蔬菜温室技术、马铃薯种薯培育等，挪威提供海洋渔业资源调查船，瑞典、芬兰提供禽流感防治研究，水稻病虫害防治技术等。这些众多项目，对于解决我国不同地区的关键性农业技术，都有促进、示范作用。

民间援助。国外一些企业的友好人士向我国提供农业援助，包括资金、设备、技术等。如日本米可多商社石本正一先生，1985-1995年期间赠送和推广塑料薄膜地面复盖技术应用，并援助多座设施农业大棚。泰国正大集团1993年向北京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各赠送肉鸡父母代养鸡及配套孵化场及商品代肉鸡场设备。美国孟山都、百事可乐、福特基金洛克菲勒基金会、瑞士先正达公司等均资助我发展农业科技教育事业。日本国际协力财团理事长神内一良先生向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捐赠1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奖励优秀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等。

六、发展农产品国际贸易，促进世界经济繁荣

我国农村商品经济不发达，农产品国内外贸易市场滞后。1978年中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仅61亿美元。随着农业与城市化发展，农产品对外贸易有了迅速发展。1989年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达200多亿美元，1995年超过300亿美元。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我国需融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提倡有条件的贸易自由化，各成员国权利与义务相等，完全平等，重大决策需四分之三成员国通过，其职能是制定规划，开放市场，解决争端。

联合国粮农组织，在 1990 年前，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称为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把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东欧、中国、越南、朝鲜、古巴等）称中央计划经济国家，1990 年苏联体制瓦解后，把苏联和东欧称为转型经济国家（即待市场经济国家）；把中国等列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取得国际认可，是一个艰苦过程。从 1986 年开始就申请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经不断谈判，要求我国全面开放市场，降低关税，取消出口补贴，减少外汇管理，价格市场化，吸收外资政策透明度，服务贸易准入放宽等措施。就此与 90 多个国家谈判，达成协议，到 2001 年 12 月 1 日才获通过，正式加入该组织。

农产品国际贸易原由外贸部门主管，为维护国家利益和遵守国际贸易准则所作出相应承诺，需农业部门共同参与，因此农业部设立了国际合作司贸易处和农业对外贸易中心。

2002 年 12 月，国家对农业法相应作了补充与修改，增加了农业投入与支持保护的内容，对农产品进口保护和促进出口扶植的措施，支持开展农业信息和产前产中产后的社会服务等内容。农业部还制定了《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建立与完善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检测体系和产品认证体系，积极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安全水平。

农产品关税由 2001 年的 23.1% 降到 15%（各世界平均水平 62% 的 1/4）。对粮、油、糖、羊毛等进口实行关税配额管理，2006 年取消食油进口关税配额管理，实行 9% 的单一关税政策，农业对国内支持、补贴约束在该产品产值的 8.5% 之内，取消所有农产品出口补贴。推进与东盟、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双边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建立自由贸易区。积极参加世贸组织农业谈判，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的原则，坚持对农业的合理保护，注重长远利益，尽最大努力保护有限的关税手段，预留必要的政策调整空间，确保农业持续健康发展。

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发展加快，进出口贸易总额，2001 年 279.1 亿美元，比 1978 年增长 3.5 倍多。2010 年达 1207.9 亿美元，2017 年达 2013.9 亿美元，其中出口 755.3 亿美元，进口 1258.6 亿美元。成为世界农产品贸易第二大国、农产品进口第二大国、出口第五大国。2004 年前为农产品贸易顺差国，2004 年开始为逆差国，当年逆差 11.3 亿美元，2015 年逆差 462 亿美元，2017 年逆差 503.3 亿美元。进口以土地密集型粮油产品为主，2017 年进口谷物 2398 万吨，大豆 9553 万吨，油菜籽 475 万吨，棕榈油 508 万吨，出口以劳动密集型的蔬菜、果品、水产品为主，有利缓解我国水土资源紧缺的压力，保障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出口市场和进口渠道逐步多元化。国内出口基地由东部为主向西部地区扩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成为出口主力军。

为了促进农产品出口，近多年来，农业部积极支持与组织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赴境外参加国际农业博览会，参加贸促会举办的各种展览、农业食品展销会，并通过农业经贸合作论坛、洽谈会等，努力向国外开展优势农产品营销、促销推介等活动，宣传与提升我国优势农产品出口声誉，树立国际良好形象，同时不断支持优质农产品出口基地和品牌示范的建设。重视加强对农业经贸管理人才的培训，推进农产品出口创汇。

七、互利共赢，发展境外农业合作

1979 年起，我国倡导农业领域“南南”合作，并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优势互补，开展互利共赢合作，推进农业共同发展。1985 年中国水产集团首先到非洲开创合作捕捞，取得良好效益和信誉。到 2016 年底，我国远洋渔业有渔船 2571 艘，年产量约 200 万吨，作业海域分布 40 个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及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公海及南极海域。一些国营企业，乡镇企业、地方、民营企业等相继走出去，开展境外合作。由小到大，采取租赁、独资、合资等各种形式，从事粮、油、棉、糖、菜、果、饲料、养猪、禽、兔、牛奶、奶制品、油橄榄、油棕、橡胶、剑麻、葡萄酒以及水产的生产、加工、兽药、农机等各产业链，有的还建农业综合

开发区。重点在东盟、俄罗斯及中亚、非洲和巴西、阿根廷，也有在欧美、澳、新西兰的一些发达国家。据商务部资料，2004-2010 年止，我国农林牧渔业对外投资存量由 8.3 亿美元，增加到 26.12 亿美元。2013 年对外投资企业达 379 家，投资存量达 37.13 亿美元，遍及 71 个国家，解决东道国 10.9 万人就业。

2013 年农业部制定了《2013-2020 年境外农业资源合作开发的发展计划》，支持中国机械美诺公司牵头，成立了中国境外农业开发产业联盟，鼓励推动企业强强联合，发挥各自优势，形成走出去产业链。2014 年国家进一步重视农业对外合作，成立了农业对外合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农业部牵头联合有关部委统一协调，给予政策、贷款的扶植与支持，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项目为载体，政府服务为保障，围绕保障农产品供给和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在更大范围领域，更高层次上组织参与重点产业和区域的农业对外投资合作计划。全国有 24 个省、区、市也建立了省级农业对外合作联席会议工作机制，并出台了“实施意见”，湖北、海南、广东等 16 个省市制定了走出去的规划。2016 年农业部又制定了《2016-2020 年农业对外合作规划》，在中国农科院成立了海外农业研究中心，并建立农业对外合作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举办走出去农业企业人才培养，征集项目信息与评价等工作体系。

据商务部 2016 年底统计，境外农业领域投资存量 148.85 亿美元，扩展到 90 多个国家。现在已拥有一批骨干企业。如中国水产总公司，中国农业发展公司等，特别是中国粮食集团公司，已收购全球两大粮商(荷兰基尼德拉集团和新加坡来宝公司)，其资产与机构复盖 60 个国家与地区，业务涉及 140 多个国家与地区，海外经营收入占一半以上，经营量达 1 亿吨，海外员工超过 2 万人，预计到 2020 年海外营业收入将占 60%以上，海外粮源掌握量超过 5000 万吨，第三国贸易量超过 8000 万吨，总经营量达 2 亿吨，成为国家粮食进出口战略的国家队。还有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如黑龙江农垦集团，云南农垦集团，广东农垦公司等。2016 年底统计，我国农垦部门在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设了 106 个合作项目，境外产值 460 亿元人民币，净利润 15 亿元人民币。集体民营企业在境外合作更多，如伊利、蒙牛奶业，光明食品，双汇食品，上海鹏欣集团，四川新希望集团等都在发展壮大。如光明集团海外企业总营业收入达 226 亿元人民币，海外资产总额 329 亿元人民币，海外员工 1.2 万人以上。中国杨凌投资贸易服务中心在哈萨克斯坦、美国等 6 个海外农业示范园区，推广农业对外投资与中国农业技术装备，加快农业对外开放步伐，增强企业国际竞争能力。

2013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经济带建设以来，得到沿线国家地区热烈响应，实施。在东南亚、中亚、南亚、西亚、中东欧非洲等区域 23 个国家商谈建立自由贸易区并加强农业科技经贸合作。2016 年底统计，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农业投资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项目已达 185 个，合计 156 亿元人民币。2017 年 11 月统计，我国与沿线 58 个国家，其他地区国家及 6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126 个多双边合作协议。推动我国农业优势产能走出去，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可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拓展更大空间，有利缓解国内资源环境压力，巩固我粮食食品安全，同时可以助力推动各国农业共同进步、繁荣发展，有利共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实施。

八、扩大农业援外，推进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

我国与发展中国家同命运，共呼吸，都经受强国侵略压迫，贫困后进。从 1953 年起，就力所能及向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农业援助。上世纪 70 年代恢复联合国合法地位后，接替台湾农耕队在非洲 22 个国家农业援外任务。到 1978 年执行农业援外项目达 127 个。1979-1987 年又增加了 39 个农业援助项目。1982 年援外体制改革，由经贸部统筹招标，由各部与省市承办，农业部成立了农牧渔业国际合作公司，按“守约，保质、薄利、重义”的方针，执行农业援外 60 多个项目，包括种稻、蔬菜、茶叶、棉花、养鱼、养蚕、沼气等，并与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粮农组织合作，接受发展中国家学员来华进行技术培训。1995年起，引入市场经济机制，给予贷款支持。

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后，农业援外进入新阶段，以建立境外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以及派专家指导和来华培训等方式援外，逐步加大了农业对外援助的力度。1996年和2004年向联合国粮农组织二次捐赠共8000万美元，支持“南南”合作，通过粮农组织粮食安全特别计划框架下，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农业技术援助。“授人以渔”，积极帮助他们提高农业生产能力。2008-2017年间，我国向非洲国家援助27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向非洲35个国家派出农业专家567人次，农业职业教育教师332人次，帮助受援国在当地培训约5万名农业人员，在华举办200个培训班，培训3000多名农业官员和技术人员。

2004年我国向非洲提供“现代化合作计划”，援助600亿美元，其中将建立100个乡村实施农业富民工程，派30批农业专家赴非洲，建立中非农业科研机构（10+10）合作机制，配置设备专家，帮助推进实施农业现代化建设。在肯尼亚援建中非联合研究中心，从事农业技术开发研究示范和培训高级人才。2014年李克强总理访非，宣布支持非洲实施农业优质高产示范工程，5年内为非洲培训1000名农技管理人员。向东盟国家和拉美国家提供农业技术援助，执行技术促进项目，支持农作物育种，推广良种与技术改进，人员培训。在亚洲周边国家组织跨境动植物疫病防控等项目实施。2014年向上海合作组织捐赠5000万美元，用于成员国农机推广和人员培训。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为最贫困国家提供20亿美元的发展援助和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力争2030年达120亿美元，其中都有农业技术教育援外的项目。

据商务部资料，2015年底止，我国援外完成270多个项目，派出1万多人次专家与技术人员，帮助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在当地培训18万多名农业技术人员，在华培训4万多名农业官员与技术人员，还提供大量农机、良种、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还进行粮食援助，救济灾民。仅2016年就向非洲14个国家提供紧急粮援（7亿多元人民币）。累计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饥饿人口近1亿人。

农业援外是我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受到受援国的赞扬与好评。如布隆迪农业部长说：“中国专家的水稻示范超高产，将载入布隆迪史册，坚定了布隆迪用中国农业技术，解决本国粮食安全的信心。”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理表示：“中国专家积极挖掘我国农牧业发展潜力，增加了粮食、蔬菜和肉类供应，为我国做出了巨大贡献。”

九、国际地位提高，对外影响力增强

40年来，我国农业发展取得很大成就，以世界11%的农用地，养活占世界20%的人口，贫困人口大幅减少，人民生活显著改善，连续十多年农业增产，深获国际好评。1999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曾授“农民”奖章予江泽民主席，表彰中国农业的巨大成就。1993年农业部何康部长，2004年水稻育种专家袁隆平院士分别获得“世界粮食奖”，2011年12月联合国粮农组织与开发计划署联合授予中国农业部“南南合作”特别贡献奖。2015年联合国粮农组织表扬中国，被授予完成世界粮食首脑会议“2015年贫困营养不良人口减少一半目标”的证书，成为国际农业扶贫发展的典范。

当今国际社会十分关注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面临减少农村贫困与营养不良人口，保障粮食与食品安全，保护农业资源，改善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与自然灾害，城乡协调发展，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等挑战，需要认真对待，共同协力解决。我国积极参加农业国际事务，努力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近几年来，国际机构与地区多边组织召开的农业论坛与农业专业会议日益增多，不少在中国召开或由中方主持或主办。如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中国与欧盟，中东欧、东盟、非洲、拉美，二十国集团等高层次

农业部长会议以及世界农业科学院院长，世界农业展望大会等。特别是 2012 年起，我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积极推动全球农业治理体系变革，主动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获得国际社会的赞同响应。在多边舞台上，我国充分阐述中国的主张与观点，表达发展中国家的呼声，引领全球农业治理体系新发展。如 2016 年在昆明召开的中国—中东欧国家（16+1）农业部长会议暨国际农业经贸合作论坛，发表了“昆明共同宣言”，宣扬中国绿色发展理念和建设“一带一路”的倡议，获得各方共识与响应。在西安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农业部长会议，有副部长级以上 44 名和四个国际农业组织的第一把手参加，由我东道国设置议题，磋商主导权推进会议，并创新有部长、科学家，企业家三位一体的开会方式，取得了里程碑意义的成果，突出了中国绿色发展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获得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三大农业国际机构的集体响应与支持。在杭州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首脑峰会，把粮食安全纳入重要领域，并赞成实现二十国集团农业部长会议的机制化。2013 年我国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发达国家）联合在北京召开世界农业展望大会，发布“2013-2020 年农业展望”报告，专章介绍中国农业，提升我国农业对全球农业信息的影响力。

在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食品法典委员会，国际植物保护公约，联合国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及 8 个区域性渔业组织等机构，常要讨论规章、制度、协定，并修订标准细则等事务，带动辐射的效应很强，中方必须认真应对，提出明确表态意见，要有理有节，力争维护国家利益，遵守国际秩序。中国的意见一般能得到尊重或采纳。

2013 年起，我国积极推动国际社会重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促进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我国率先制定了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并申报了一批农业文化遗产项目，迄今已有 13 个项目获联合国粮农组织批准（占认定总数的 1/3），居世界首位。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誉为世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领军者。中国历史悠久，丰富多彩的农耕文化，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与颂扬。

（作者：原农业部外事司司长（1979-1988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计划委员会委员（1989-1992 年）；注：承农业部国际合作司提供 2012-2017 年工作总结档案资料，特此致以衷心感谢！）

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面貌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林 干

一、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的一招

1978 年 12 月 18 日举行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一次重大而深远的会议，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为核心，倡导中国要走自己的路，进行改革开放，“不改革开放是死路一条”，摸着石头过河，杀出一条血路来。为什么要改革开放，在经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大跃进时期，赶英超美

一天等于 20 年，全民大炼钢铁，卫星上天，元帅升帐，插红旗拔白旗，造成了极大破坏，实现人民公社制度，千篇一律办食堂，瞎指挥，浮夸，平调风和共产风，泛滥成灾，歪风猖獗。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执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为口号，任其发展下去，就有亡党亡国危险，生产下降几乎造成经济崩溃的边缘，邓小平以一个老共产党员党的元老挺身而出，领导人民改革开放深得民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进行真理标准大讨论，突破两个凡是纠正冤假错案，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实行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引进外资，建设四个经济特区，14 个经济开放区和确立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四个特色发展区域，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了包产到户，大刀阔斧打破束缚人民手脚的条条框框，最大限度发挥亿万人民群众发展生产积极性，有力地推动经济的发展。

这里值得回味的是新中国建立初期，进行了三年(1950-1952 年)恢复时期和第一个国民经济计划(1953-1957 年)这八年有条不紊进行经济建设，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生活不断提高和改善，人民是满意的，问题是后来 19 年(1958-1976 年)正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年代，世界经济不断发展显示一片繁荣景象，20 世纪 60 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崛起，而中国死抱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能够救中国不放，由于决策失误，造成了经济严重挫折。

改革开放经过 40 年(1978-2018 年)，经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11 届-19 届)坚持改革不动摇，马不停蹄的一届接着一届干，不断创新使改革开放政策更加完备，有了改革开放这一招使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走进新时代，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这一招，或许我们还在贫穷落后道路中游荡徘徊。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发展最迅速最令人前往的国度，五彩缤纷的多元化文化在这里融和生长。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是相当的经济增速使得中国依旧是世界上极其吸引力的市场。国外评论说 40 年前中国开始追赶世界，20 年前中国融入世界，如今中国正在影响并改变世界。40 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我们走的这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复兴之路，富国之路，幸福之路，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永远走下去。

二、改革开放使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40 年前冲破多年禁锢，改革开放的开启，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和社会活力的释放，一路走来中国实现了从贫穷落后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的飞跃，中国社会面貌和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短短 40 年，走过西方国家几百年发展之路，综合国力不断提升，40 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变化巨大，是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成绩的伟大堪称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1978 年国内生产总值 3678 亿元，占世界经济总量 1.8%，2017 年 827122 亿元（约 12 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 15%左右，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教育、航天、文化、军事、全覆盖全面发展，一大批新产品走在世界前列，改革开放 40 年间有 30 年，年增长速度均在 10%左右，最近几年增速放缓，年均增长在 6-7%之间。由于基础增大，每年增量 8000 亿美元，相当一个中等国家总量，也相当于德国、法国、意大利三国增量总和。经过不懈奋斗，我们在 2005 年到 2010 年间经济总量一步一步的先后相继超过英、法、意、德、日，步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贡献率达 30%以上，超过美国、欧洲、日本的总和。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没有几年又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这几年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中国经济确红红火火，在全球最具活力。

改革开放人们盼来了好日子，1978 年人均国民收入 190 美元，属于低收入国家，84%的人生活在每天 1.25 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之下，2002 年人均 GDP 达到 1045 美元门槛，到 2010 年中国人均 GDP 达到 4126 美元的标准，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2017 年达到 8260 美元，步入中高收入国家，老百姓生活进入小康水平。2017 年财

政收入达 17 万亿，外汇储备 3.1 万亿美元，两年前曾达到近 4 万亿美元的储备。居民储备占 GDP 份额为 45%，远高于日本的 28%，中国居民储蓄是相当于美国+欧洲的总和。2017 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 25974 元比 2016 年 23821 元增长 7.3%。国内旅游人数达 50 亿人次，出国旅游达 1.4 亿人次。改革开放 40 年出国留学人员累计 519.49 万人，目前有 145.41 万人，正在国外进行学习和研究。83.73%留学人员选择回国发展，根据 2017 年数据出国留学首次突破 60 万大关，达 60.84 万人，同年留学人员回国达 48.09 万人，海外人才加速回流。十八大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增速持续快于经济增速，城镇化率不断提升，改革开放初期农村人口占 80%左右，城镇人口占 20%左右，现在人口 13 亿多人，其中农村人口占 40%，现在一大批农民变成城镇人口，这些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使农民富裕最大的表现。

中国在全球影响力与日俱增，弱国无外交，现在我们强起来，国际地位得到了大大的提高，中国声誉、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经验、中国主张、几乎得到全球共识，如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被联合国认同，写进了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决议中，这一理念正在被许多国家采纳。

中国崛起为世界提供了发展正能量，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为沿线各国人民造福，得到了广泛认同，涉及 64 个国家目前已有 100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和支持，开发建设，正在有序进行，得到了好评。中国倡导的亚投行已有 84 成员国参与得到世界认可。人民币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成为国际货币，同美元、英镑、欧元、日元平起平坐，提高了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中的地位和信誉。中国实施走出去的战略，不断扩大大方兴未艾，中国投资合作身影遍布全球 160 个国家，大约 1700 亿美元。中国对外投资援助总额，目前已超过美国，占世界之首。

孔子学院遍布全球，目前已有 140 个国家设立了 510 家，孔子学院学生总数已达 200 万人，世界上开始学汉语，用汉语已成为新潮流看好中国。中国自信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大国外交面向世界，国际事务离不开中国参与，全球有十个重要国家，他们是美国、中国、法国、英国、德国、日本、俄罗斯、意大利、加拿大、印度，中国是全球所有国家中前途最可预见的国家，中国逐渐从崭露头角到领袖地位，世界秩序中心正从西向东转向中国。

三、改革开放让广大农村摆脱了一穷二白迎来了小康。

1. 长时间受割私人尾巴的影响，过去想干不能干，改革开放想干就能干，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彻底改变了吃大锅饭的弊端，改革开放焕发出广大农民前所未有的积极性。安徽小岗村有 18 户农民，红手印解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停止了人民公社制度，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发挥主动性灵活性。想种什么就种什么，不受上面层层下达生产计划指标约束。与此同时家庭副业，手工业得到大量恢复，开放农村市场。乡镇企业的崛起，覆盖了全国乡村，被小平同志誉为异军突起，造就了半壁江山，成为农村致富之路，与此同时国家废除禁令，让农民到城里打工，形成了农民工热潮，现在已达 2.8 亿人，在短短几年中温饱问题解决了，收入增加了，日子也好过了，农村也活了起来，奔小康成为农村一大亮点。

2. 粮食稳天下安做到粮食自给，从 2001-2017 年以来，有 12 年粮食连增，其后的五年虽然不提连增，但每年的收成也不错，每年超过 6 亿吨(1.2 万亿斤)，粮食生产出现了重大转机，年增稳固在 1.2 万亿斤，其中 12 年连增，2017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 61701 万吨，比 1978 年 30477 万吨，增量 31224 万吨，增长了一倍，牢牢把饭碗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党中央极为关注三农，把三农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在财力上科技上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从 1998 年起每年春耕前，以党中央名义发布中央一号文件，具体进行指导农业生产已连续

了 20 年。有了好政策，保证了农业持续发展，农业进步科技贡献率已达 56.2%。

3. 中国的脱贫为世界树立了典范，改革开放初期到 2012 年，全国有 7 亿人口脱贫，为全球脱贫年贡献 90%，有人估计中国经济发展使 1/5 的世界贫困人口，1/4 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和 3/5 的下中等收入国家人口从中直接受益。从 2012 年剩下的 7000 万贫困人口，每年减少 1000 多万人，剩下来的 3000 多万贫困户将在 2020 年全部脱贫。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最好成绩，中国的减贫为世界树立了榜样，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伟大工程，得到世界上高度评价和赞誉，党的十八大这五年贫困人口减少 6800 万人，贫困率从 10.2% 下降到 3.1%，脱贫攻坚力度之大，影响之深前所未有。

4. 利用外资建设了一批农田和生产基地，有利的促进了农业发展。改革开放初期由农业部牵头，组织领导班子进行卓有成效的引进外资，建设一批农田和农副产品生产基地，有力地促进了加快农业发展举措。从 1979 到 2006 年全国农业利用外资规模达 130 亿美元之多，此外地方积极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农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外商投资的项目达 76762 个，累计投资总额 283.43 亿元，有力地支持农村现代化发展进程。利用外资建设了一批科技水平高，急需要办的符合中国实际的重点农业项目，做到投资少收效大，效益高产出高的农业项目，产出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发挥了示范作用，这些项目概括为：①以华北平原农业项目，黑龙江农垦项目，和南方红壤土为代表的开发和利用土地资源改造中低产田。②以增产生产粮棉油糖为主的山水林田路的综合治理，开发形成生产基地。③以八大城市和 14 个城市淡水养鱼项目，六大城市和 20 城市奶类项目和从东欧国家引进养鸡设备为代表的现代化的生产技术，提高畜牧业的生产率和商品率，为大中城市提供更多的农副产品，解决了吃奶难、吃鱼难、吃蛋难的难题，丰富市民菜篮子，④还建设一批具有农业特色战略性骨干项目，主要有广东橡胶发展项目，长江中上游柑橘为主农业开发项目，种子项目，甘肃新疆牧业发展项目，北方草原与畜牧发展项目，山东烟台地区六县改造丘陵地区土壤提高花生产量和质量项目。⑤此外还建设了一批创汇农业项目，包括农业、畜牧业、水产业、特色农业从生产加工到出口全覆盖，这些项目的建成对农业持续发展，增加农业后劲增收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国家利用土地出让占用资金建设了一大批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31 个省区市覆盖，确保农业生产持续，稳定发展，将一些低产田，效益不高的盐碱地、涝洼地、干旱地、撂荒地、坡耕地、跑水跑肥跑土的低产田进行治理改造开发，建立灌溉系统，确保增产增收。

四、让改革开放之花永续绽放

1. 认真学好用好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同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九大的决议是全党全国人民的行动纲领，习近平同志的新时代思想，是实现两个 100 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目标的根本保证，牢牢把握两个 100 年奋斗目标路线图十九大期间决胜第一个 100 年奋斗目标，全面实行小康社会，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要努力奋斗四个伟大。

2. 维护党中央权威，习近平同志是党的核心是人民爱戴的领袖，我们要紧密的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忠于党忠于人民，听党指挥听党的话跟党走。

3. 要抓住新机遇阔步前进，把我们自己的事办大办好，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对我们十分有利我们的经济实力非常雄厚，对世界影响力大，有感召力，中国人还有开拓创新敢于拼搏精神，正走向新时代，中央提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决心，就要走好这个时期快马加鞭往前冲，有多大能耐都要使出来，我们有 5000 年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有 13 亿多人民，8 亿多劳动力有 1.3 亿科技工作者，是创造财富最大宝库，没有理由办不好中国的事。

4. 今年三月在北京举行了人大政协会议，通过了国家宪法，政府工作报告，批准了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还通过选举任命了国家领导人和各部门负责人，在两会 5000 人代表中，决心实现两个 100 年奋斗目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发出了一个共同心声，在国家机构改革中选用了一大批有能力有办法有开拓精神，热情高干劲足德才兼备有经验丰富的新人管理国家，进入国家领导机构，必将产生新的效益。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兴旺充满活力。

5. 认真总结改革开放 40 周年经验，以利加快前行。在改革开放初期，建立了四个经济特区，沿海沿江又建设了 14 个开放区，划分了东部中部西部东北老工业基地四个区域，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1980 年深圳设立的经济特区，2017 年深圳 GDP 达到约 2.2 万亿人民币，是改革开放初期的 1.1 万倍以上，并首次超过了香港，真是了不起。邓小平同志还提出先富帮后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正在一步一步的显现。十八大这五年在习近平同志领导下干得好成绩显著，经济加快发展创造了多个奇迹，在习近平同志的治国理政新思想指导下，提出实现两个 100 年奋斗目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领导全国人民攻坚克难，啃了不少硬骨头，爬坡过坎趟过深水区，改革了 1500 件大事，这五年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在世界影响力得到普遍的提高，前所未有的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时候，以新理念新思想新挑战推进五位一体，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个自信四个意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不断涌现，老百姓形容如今天上没有的我们有了，指航天事业发展，地上没有的我们也有了，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突飞猛进，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达到 57.5%。积极推进京、津、冀协调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建设了 14 个自贸区，建立雄安新区，出台了一系列促进西部发展，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的改革创新举措。有了十八大进入了新时代，改革开放 40 年一再证明，我们所走的道路，是无比正确的，越走越宽广。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坚持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从辉煌走向辉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一定能实现。

（作者：原农业部对外经济办公室主任、中国驻联合国粮农组织代表；本文曾于 2018 年 4 月 12 日在农业部离退休干部局团结湖活动站读书组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一次的发言）

学习十九大精神的感想和初步体会

陈开臻

学习十九大精神的感想和初步体会，谈谈几点：

一、深深感到党的十九大开得很好、很成功，在党内国内和世界上引起了高度重视，强烈反响。

大会期间，不少地方的党员和群众就自动学习座谈起来，世界上许多政党领导和国家领导人高度评论、赞扬，发来贺电 800 多份。开会期间和会后一段时间，我是天天听看十九大新闻，阅读十九大文件和有关材料，

深受鼓舞。

二、我感到学习时首先要了解掌十九大的历史定位和大会的主题,大会关于报告的决议、报告的重大意义。

十九大的历史定位:十九大是从现在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关
键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党内盛会。

大会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十
八届中央委员会作的报告的主要精神。

大会关于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高度评价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决议是报告
的要点,报告是新时代我们党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三、学习报告,我觉得要在系统学习的基础上掌握以下重点:

(一) 深刻认识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五年工作的巨大成就的重大意义。

(二) 深刻认识新时代、新的主要矛盾、历史使命。

(三) 深刻认识新思想、也是新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学习的主线。

(四) 深刻认识新征程与新目标(战略安排——两步走)

下面我就上述几个重点谈谈学习的初步体会:

(一) 充分认识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五年工作巨大成就的重要意义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我们党和国家发展进程及不平凡的五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
了历史性成就。中央以顽强意志正风肃纪,反腐惩恶,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这五年,我们党解决了许多
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
从而使我国发展进入新时代。

深刻认识这五年工作的巨大成就,从而使我們进一步认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强
领导,进一步认识习近平同志是杰出的政治家和理论家,是我们党的英明领袖,我们要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

习近平同志在这五年里,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二) 深刻认识新时代、新主要矛盾、历史使命。

新时代是习近平同志报告一个重大的新论断,意义重大,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定位。

为什么说我国进入新时代?有三新:

1. 主要矛盾新,因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分析国内形势变化得出一个新的论断。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
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许多新要求。

2. 新时代意义新,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3. 新时代是新任务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全面小康,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逐步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新时代我们党的历史使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三）深刻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学习的主线。

1. 要认识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伟大时代课题，习近平同志结合实践作出了系统的阐述，提出了八个明确和 14 个基本方略。在报告中有详细论述。

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意义有三：（1）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大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2）这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长期指导思想，各方面工作的指导方针。（3）有世界意义对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有借鉴意义。

（四）深刻认识新征程与新目标，新战略安排

我们党和国家全国人民进入新征程是进入全面建成全面小康的决胜期，乘势而上开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从 2020 年到本世纪中叶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阶段，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各阶段，从 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十九大确定的重大战略安排，意义非常重大。

大会同意报告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部署，大会强调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必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必须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大会同意报告提出的对外工作方针，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大会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地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大会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认真学习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三大历史任务继续奋斗。我们要坚决响应大会号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是坚强有力的，一定能够把十九大的报告、决议贯彻落实好，带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把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夺取更大的胜利，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学习新修改的党章，要充分认识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重大意义；要认识这次党代会对党章有哪些修改，修改的意义。

（作者：原农业部机关党委副书记，2017 年 11 月 10 日在读书小组发言）

纪念农村改革四十周年专题之三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农村的主要事件

郭书田

在纪念今年农村改革 40 周年的过程中，自然会联系到改革开放前 30 年农村状况的解析，需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实事求是地加以客观评述。

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多部著作中，对农业与农民问题有许多重要论述。1936 年在延安与斯诺一次谈话中特别指出，在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谁赢得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蒋介石在退到台湾反思与毛泽东较量失败的原因时，认为毛泽东依靠了农民而他没有依靠农民。毛泽东在全国胜利前夕中央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谈到党的工作重点要由农村转向城市时，就强调指出绝不能丢掉农村只顾城市，如果是这样那是完全错误的。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他一贯把农业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实行以工业为主导、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在财政支出中以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为序。在《论十大关系》中特别强调，要处理好工农关系与城乡关系。历史实践充分证明，这些理念与主张得到贯彻的时候，农业就发展，反之背离这些理念与主张时，农业就受到挫折。

回顾前 30 多年来农村的一些重大事件，有助于以史为鉴，发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作用，也有助于理解农村改革的历史背景与由来。

一、制定《土地改革法》，实行土地改革。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件大事，使农民获得了 3 亿多亩土地，免交数百亿斤粮食地租，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在实施过程中也有一些左的错误，而总体是成功的。有人认为，台湾的和平土改，采取向地主赎买的政策，效果很好。大陆当时是一穷二白，没有这个条件，采取发动群众废除地主土地所有，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是农村社会的一个巨大进步。

二、通过互助合作的方式，将农民组织起来，发展农业生产。在土地改革以后，农民成为分散的生产者，容易产生两极分化。为此，不失时机地先组织农民参加临时性季节性互助组，然后过渡为固定性长期性互助组，在此基础上，按自愿原则，建立起以土地入股为特征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出现“私有公营”的格局，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与此同时，建立了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供销合作社与信用合作社，受到农民的欢迎。河北省遵化县农民王国藩建立的第一个合作社，只有一头三条腿的毛驴，毛泽东称赞这是五亿农民的方向。

三、在中央政府建立起来以后，在政务院成立了主管农业的农业部。由辛亥革命的元老之一李书城任首届部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址就在他的家里），任期四年。为使农业迅速恢复到 1936 年战前的水平，采取了几项重要措施：推广新式的三论三铧犁，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开展爱国丰产竞赛运动，筛选优良种子，加强管理，增加生产；推广硫酸铵化学肥料以及 666 农药，防止虫害；评选与奖励农业生产劳动模范，他们为曲耀离、李顺达、耿长锁、王国藩等，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在合作社内部为避免出工不出力，采取小包工办法。

四、为指导农业合作运动健康发展，在中央成立农村工作部。由邓子恢任部长，陈正人、王观澜、廖鲁言任副部长，杜润生任秘书长。主张有步骤稳步发展，但遭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小脚女人走路，农村工作部由此撤销。在初级社尚未完全巩固的情况下，急速地把土地、牲畜、农具无偿转为集体所有的高级合作社，象征着“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已经实现，也就是以消灭私有制为核心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意味着在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是一次路线的重大失误，为尔后提出高举“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也为开展“四清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推进政治战线社会主义革命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根据。从理论与实践上消除这次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左倾路线的失误与产生的严重后果十分必要。

五、农民在工业化中的贡献。在工业化中，全面学习苏联，依靠苏联援助的 156 个项目，发展由国家投资、国家管理和以重工业为主的国营工业企业，建立起来独自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取得了包括“两弹一星”在内的一系列成就。需要指出的是为这个工业化中提供原始积累的是农民，国家实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政策，提高工业品价格 1475 亿元，降低农产品价格 8019 亿元，合计 9494 亿元。没有农民提供这个巨额的原始积累，就不会有今天的工业化。另外苏联援助的 156 个项目的贷款与利息，也是由农民种植茶叶出口创汇 3.39 亿美元全部偿还的。

六、“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时隔两年，在三面红旗指引下，开展轰轰烈烈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大跃进中，提出一天等于 20 年与用 15 年或更短的时间超英赶美的目标，在农村出现了严重的刮“五风”（高指标、瞎指挥、特殊化、浮夸、平调共产），粮食生产放卫星，从河南遂平冬小麦亩产 3200 斤的第一颗卫星到青海格尔木亩产春小麦 8000 斤；在山区毁林开荒，在牧区毁草开荒，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与荒漠化。更为严重的是遇天灾使粮食减产的情况下，一些地方向农民强迫征购过头粮，造成非正常死亡的悲惨事件，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59 年全国人口减少 447 万，1960 年减少 1692 万，1961 年减少 18 万。

七、所有制三个过渡。在大跃进中，有些地方出现并社事件，产生了人民公社，第一个人民公社是河南省遂平县嵒岈山公社，毛泽东赞赏说“人民公社好”，其特点是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并举。1958 年中央北戴河会议作出建立人民公社的决定，由此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在全国开展起来，认为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北京市郊区曾选出十个人民公社，实行全民所有制。但是人民公社是以乡为单位，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为公社的生产大队，原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为生产队，形成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的集体所有制，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把土地、劳力、牲畜、农具四固定到生产队，少数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如大寨，随后在制定的人民公社条例（六十条）中加以确认。之后，毛泽东提出三个过渡设想：一是在人民公社内部由生产队——生产大队——公社集体所有过渡；二是由集体所有制公社向全民所有制公社过渡；三是由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有一些地方出现急于过渡的做法，引起农民强烈不满，被批评为“穷过渡”。

在从 1958 年人民公社大跃进进到 1978 年人民公社解体的 20 年中，包括 10 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严重的路线失误，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但是也应看到，在左倾路线占主导地位的形势下，有一些值得重视的举措。

八、坚持增加粮食生产。在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两次失误中，农民既是严重的受害者，又是农业生产的坚持者。期间农业产值由 550 亿元增加到 1288 亿元，粮食产量由 2 亿吨增加到 3 亿吨；即使 10 年动乱的文

革期间，农业产值由 640 亿元增加到 1197 亿元，粮食产量由 2.14 亿吨增加到 2.8 亿吨，基本上保证了城市居民对粮食与副食品的最低需求，为维护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九、制定了农业发展纲要 40 条。把全国农业划为三个区域，以粮食产量为目标，在黄河以北为亩产 400 斤；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为 500 斤；在长江以南为 800 斤，简称“四、五、八”，并制定了相应的农业技术措施。

十、农业现代化的“四化”。在提出工业、农业、科技、国防四个现代化中，农业现代化为：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化学化“四化”。为此，大兴以建设水库为主的水利建设，增加有效灌溉面积，提高抗灾能力，如河南林县引水上山的红旗渠等。毛泽东称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大力发展机械工业成立了第八机械工业部（即农业机械工业部），生产各种型号的农业机械，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毛泽东称机械化是农业的根本出路，特别是在文革中，从国外引进 13 套年产 30 万吨合成氨的大化肥厂，在改革开放后开始后投产，对粮食的增产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十一、制定农业“八字宪法”，实行科学种田。在总结农民创造的实践经验基础上，提出并支持农业的“八字宪法”，即水、肥、土、种、密、保、工、管，后根据专家建议，把土放在了首位，变为土、水、肥……。这对促进农业的技术进步，提高农业的科技贡献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推广了一批农业科学家培育出来的高产抗病的小麦、水稻与玉米杂交品种，对增加粮食产量作出了重要贡献。

十二、农业学大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发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修筑堤坝，将七沟八坡改变为梯田，防治了水土流失。采用高温堆肥的办法，改良土壤，提高地力，大幅增加了粮食产量，改善了农民生活。毛泽东提出工业学大庆（王进喜），农业学大寨（陈永贵），全国学人民解放军（雷锋），中央先后两次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与普及大寨县会议，推动农业学大寨。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大寨也出现过极左的错误，如取消自留地，关闭自由市场，取消家庭副业，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在学大寨中出现由生产队核算过渡为大队核算，在平原地区也修建梯田等，比较及时地得到纠正。

十三、组建生产建设兵团。为加强边疆建设与民族团结，在巩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础上，在国营农场建设一批新的生产建设兵团与农建师，由所在军区直接领导，接收安置大批城市知识青年。对此国家投入了巨大资金，发展场办工业，在农业现代化中增强了发挥示范作用的条件，有一批经过锻炼的青年成为党政机关的领导人。

十四、自办社会福利事业。在人民公社里，兴办了一些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事业，如敬老院、赤脚医生、五保户等，虽然是低水平的，但也受到了农民的欢迎。在瑞典召开的一次人类生命健康国际会议上，对此代表甚感兴趣，认为是中国农民的一项有益创造。

历史是不断前进的，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历史发展过程又是曲折的，虽然由于主要执政者理念错误导致失误，最终会得到纠正。中国农民是伟大的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年代为牺牲最大的群体，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中又为贡献最大的群体，在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两次失误中，又能予以实际抵制的最大群体，农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成为改革开放以后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原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高级经济师，本文写于 2018 年 1 月 24 日）

从农村改革四十年看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

陈锡文

2018年是农村改革四十周年，也是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局之年。对农村改革进行回顾、总结和展望，对于更深入理解我国现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将会有很大帮助。

一、农村改革的历程、经验和贡献

（一）改革的突破

邓小平同志讲：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习近平总书记讲：农村改革是从调整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开启的。具体讲，农村改革是从打破集体土地只能由集体统一经营的僵化认识和体制后才取得突破的。之后，农村集体土地开始实行由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形成，最初是农民的自主自发行行为，但党对农民的创造始终高度关注、不断对其进行总结、提炼和完善，并把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提升为政策进行推广。

农村最初出现“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时，中央并不赞成。1978年12月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明确提出：“可以按定额计工分，可以按时计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但这个《决定（草案）》在1979年9月四中全会正式通过时，就删除了“不许包产到户”这句话。这既体现了农民勇于创造的精神和敢于坚持的韧性，也反映出党在制定政策过程中尊重群众创造、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态度。因此，198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但农村改革中迅速普及的并不是“包产到户”，而是“包干到户”。这个转变极为重要。“包产到户”仍然保留着集体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的制度。而“包干到户”实行的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这就使农民家庭成了相对独立的经营主体，不必再实行集体统一核算和统一分配。这也就为撤销人民公社体制创造了条件，为普遍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奠定了基础。

（二）改革的贡献

农村改革所做出的贡献，既有物质方面的，更有思想观念、理论和制度方面的。

从物质方面看，它在促进增产增收、解决吃饭问题和贫困问题等方面的效果极为明显。197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6095亿斤，1984年达到了8146亿斤，增长了34.3%；人均粮食占有量，从1978年的633斤，增加到了1984年的781斤，增加了23.4%。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增长到了1984年的355元，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了1.5倍，年均增长16.2%。1978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标准为100元/人、年）为2.5亿人，贫困发生率为30.7%；到1985年农村贫困人口下降为1.25亿人（标准为206元/人、年），贫困发生率降为14.8%。

从观念、理论和制度方面看，家庭承包经营使农户成为相对独立的经营主体，这就引起了一系列更深刻

的变化。第一，在“交够国家、留足集体”的后，农民不仅可以支配“剩下是自己”的那部分产品，还可以按照市场需求来自主决定自家承包地上的种植结构，于是就在农业资源配置上开始引入市场机制。第二，由于“剩下是自己”的那部分比重不断提高，农民就具有了积累自身资产的可能性，于是就开创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局面。第三，农业的家庭承包经营，土地是集体所有的，但作用其上的生产工具和其他投入品，是农民家庭的，这就形成了改革初期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农村改革在思想、理论、制度创新上可谓贡献巨大。

2008年，在农村改革30周年时，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极大调动了亿万农民积极性，极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极大改善了广大农民物质文化生活。更为重要的是，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为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创造性探索，为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为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积累了宝贵经验。

农村改革之所以能够率先突破、首战告捷，值得总结的经验很多。其中有四条尤为重要：一是党恢复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处理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准则，即“保障农民经济利益，尊重农民民主权利”；三是尊重客观规律，农业实行家庭承包经营、按市场需求配置农业资源、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等，就是尊重农业规律、经济规律的结果；四是这样一场涉及8亿农民切身利益的深刻变革，没有引发社会的不安和动荡，最根本的是坚持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农村基础性制度。

（三）改革的深化和拓展

但农村改革毕竟是在微观层面推进的改革，虽然农民在重塑农业微观经营主体的过程中，创造了大量对全局改革具有重要借鉴和参考意义的宝贵经验，但要把改革引向宏观层面，则必须有党的决断和规划设计。实际上，在农村改革取得重大突破之后，党中央就一直在思考如何将改革进一步引向深化和拓展。

在1983年1月2日发出的第二个指导农村改革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人民公社的体制，要从两方面进行改革。这就是，实行生产责任制，特别是联产承包制；实行政社分设。

1984年元旦发出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三大重要政策：一是土地承包期延长至15年以上；二是鼓励耕地向种田能手集中；三是要求各地开展试点，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这个文件强调：随着农村分工分业的发展，将有越来越多的人脱离耕地经营，从事林牧渔业等生产，并将有较大部分转入小工业和小集镇服务业。这是一个必然的历史性进步，可为农业生产向深度广度进军，为改变人口和工业的布局创造条件。不改变“八亿农民搞饭吃”的局面，农民富裕不起来，国家富强不起来，四个现代化也就无从实现。可见，从那时起，党中央就把深化和拓展农村改革，定位在实现农民富裕、国家富强和四个现代化这样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宏伟目标上。

此后的改革进展，大体是循着这样的路径不断深化和拓展的：改革商品流通体制—改革资源要素配置机制—改革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建立城乡统筹发展的体制机制。

重要商品实行统购统销、重要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分配、劳动力就业由国家统一安排等，这些都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改革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允许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破除对农村劳动力外出流动就业的障碍，改革户籍制度等，这些方面的改革，实际就是改革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同时

也是在逐步打破城乡分割的体制壁垒。把国家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放到农村，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建立农业支持保护体系等，实质就是统筹考虑城乡发展，让公共财政惠及农业农村农民、逐步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些方面的改革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中的短板。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农业基础巩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整个大局就有保障，各项工作都会比较主动。所以农村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二、中央为何此时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7 年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2018 年中央发出的一号文件中都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笔者个人认为，最重要的原因，一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二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阶段的基本特征。

（一）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乡村不能衰败

城镇化是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和强大动力，这是已被各国实践证明了的规律。但是，世界各国的资源禀赋、人口规模、发展水平、社会制度等各不相同，在现代化过程中人口城乡分布的格局和变化必然有很大差别，因此不能简单对别国的经验照抄照搬。提出振兴乡村，绝不是不要城镇化，也不是要把城乡发展对立起来，而是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科学引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格局及其变化。

2016 年年底世界上超过 1 亿人口的国家有 13 个，其中亚洲 7 个：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孟加拉、日本、菲律宾；非洲 2 个：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北美洲 2 个：美国、墨西哥；南美洲 1 个：巴西；欧洲 1 个：俄国。这 13 个国家中已经成为经济发达国家的只有美国和日本两个。但是，美国总人口 3.2 亿，不足我国的零头；日本总人口 1.2 亿，不足我国的十分之一。世界上所有经济发达体的人口都加在一起，大概是 10 亿人。因此，人口超过 10 亿的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这在世界上还没有先例，当然也没有现成的经验。路怎么走，只能靠我们自己去探索。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人口必然逐步减少，有些村庄也会因各种原因而逐步消失，但这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更由于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具有不同的功能，城乡之间只有形成不同功能的互补，才能使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健康推进。因此不管城镇化发展到什么程度，乡村都不可能被消灭。我国的特殊性则在于人口总规模巨大，即使乡村人口的比重降到 30% 以下，但总量仍将达到几亿人。有着几亿人生活的地方怎么能不把它建设好？如果城乡差距过大，怎么能建成惠及全体人民的全面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国家？因此，实现乡村振兴是由我国国情所决定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 12 月 12 日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在人口城镇化问题上，我们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他在 2013 年 12 月 23 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必须看到，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大部分国土面积是农村，即使将来城镇化水平到了 70%，还会有四五亿人生活在农村。为此，要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农民建设幸福家园和美丽乡村。在 2017 年 12 月 28 日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重要讲话时，再次阐述了他的这一观点，可见总书记对这一问题的判断和认识是一贯的。

一个国家的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往往对它的城镇化道路和人口的城乡分布会有很大影响。我国民国时期的学者吴景超在 1937 年出版的《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一书中就分析到这个问题。他把世界各国分为四大类，一是人多地少，农业人口比重低，如西欧国家；二是人少地多，农业人口比重低，如美国、加拿大、澳洲等；三是人少地多，农业人口比重较高，如苏联；四是人多地少，但农业人口比重很高，如中国、印度及大多数

亚洲国家。他认为，这第四类国家要实行现代化，难度最大，非走自己独特的道路不可！

此外，在对城镇化问题进行国际比较时，至少还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各国的城镇化具有不同的具体形式。既有大集中、小分散的，如日本，东京地区居住着约占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韩国的首尔地区居住着约占全国一半的人口。也有大分散、小集中的，如德国，有 60% 的人口是居住在两万人以下的小镇上。第二，各国城镇化的统计口径各不相同。如按世界银行的统计，2016 年日本人口城镇化率为 92%。但日本认为这是按“市”的行政区域作的人口统计，而日本自身的统计中没有“城镇化率”这个指标，它使用的是“人口密度”的指标：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达到 4000 人以上、集聚的总人口超过 5000 人即为“人口集聚区”。目前，日本全国居住在“人口集聚区”范围内的人口，约占 70%。第三，在人口城镇化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中，不少国家和地区都在关注如何保持乡村的活力。如韩国搞过“新村运动”，日本搞了“乡村重建”计划，我国台湾省也在 2010 年制定了“乡村重生条例”，目前仍在实行。所以总书记在 2017 年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讲：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是为全球解决乡村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二）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要求乡村必须振兴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增长已经进入了“新常态”，这意味着经济的增速会适当放缓，但对发展的质量要求会更高。我国城镇化的进程也必须跳出在高增长时期形成的思维惯性，主动适应这种变化。2017 年我国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为 42.35%，比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低约 16 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有 2.3 亿农业户籍的人口虽已在城镇居住和生活，但尚未落户城镇。按“十三五”规划要求，到 2020 年年底，将有 1 亿已经在城镇定居的农民工及其家属落户城镇。但这同时也表明，现已进城的农业人口中，多数人到 2020 年年底还不能在城镇落户，何况今后还会有农业人口陆续进入城镇。因此解决好这个问题，正如总书记讲的那样：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

我国发展已经进入了新时代，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这种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突出反映在农业和乡村发展的滞后上。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要靠城镇化，但也不能只靠城镇化。一段时间以来，存在着这样一种认识，认为“三农”问题要靠城镇化来解决，只要让农民都进了城，“三农”问题自然就解决了。这样的看法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将永远存在，因此，农村发展除了借助外力之外，还必须发挥自身内在的活力。经济增速放缓、结构升级，对劳动力的需求出现了明显变化，所以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增速放缓了；但居民收入增长，达到小康水平后必然会产生出许多新的需求，这就为农村创造新的供给提供了极大的机遇。为什么会有农民工返乡创业？为什么农村会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和实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就是农业、农村、农民在适应新形势，这也说明乡村振兴有其内在的客观要求。改革以来，为解决农民就业问题，有过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有过民工潮，而现在则要通过农村的产业兴旺为农民开辟“第三就业空间”——通过产业融合和发展新产业、新业态为农民在乡村提供主要不依赖于单纯农业的就业岗位。

实施乡村振兴，就必须全面、客观地看待当前农村的现状，比如关于农村的“空心化”、“老龄化”问题。据国家电网公司对其经营区域内居民房屋空置率（年用电量低于 20 千瓦时）的统计，城镇居民房屋空置率为 12.2%（其中大中城市为 11.9%，小城市为 13.9%），而乡村居民住房空置率为 14%。据第三次农业普查的结果，在农业经营人员中，男性占 52.5%，35 岁以下人员占 19.2%，36~54 岁的人员占 47.3%，55 岁及以上人员占 33.6%。这是动员了近 400 万人，逐村、逐户填报了 2.3 亿份农户普查表的汇总结果。我国农村各地的

情况差别很大，对农村现状的了解必须全面，不能以偏概全、人云亦云。

更重要的是，农业生产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马克思讲，农业中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的不一致，是农民从事副业生产的自然基础。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普及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健全，农民在大宗作物生产上的劳动强度逐步降低，劳动时间不断减少，既使得老人、妇女比以往更能胜任日常的田间管理，又使得青壮年劳动力获得了更充裕的外出就业时间。这是技术进步背景下农业生产规律出现的新特征，对农民增收具有积极意义。如果能使农民利用好比以往更充裕的剩余劳动时间，在农村创造新的供给、满足城镇居民新的需求，那意义就更大，而这也正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本意所在。

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值得注意的若干制度性问题

如何实现乡村振兴，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和一号文件中都已作了明确部署，这里对几个值得注意的制度性问题，谈一点个人的看法，供参考。

（一）关于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讲，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坚持党的农村政策，首要的就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他还讲，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是一句空口号，而是有实实在在的政策要求，具体讲，有三个要求。第一，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这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魂”，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和本位。第二，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这集中体现在农民家庭是承包集体土地的法定主体，其他任何主体不能取代农民家庭的土地承包地位。农民家庭承包的土地，可以由农民家庭自己经营，也可以通过流转经营权由其他经营主体经营。但无论如何流转，集体土地承包权都属于农民家庭。第三，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农村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党的十九大报告又明确了农村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要看到，只有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才能实行“三权分置”。对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实行确权、登记、颁证后，农户流转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才能踏实、放心。同时，农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是否流转、怎样流转、流转给谁，只要依法合规，都要让农民自己做主，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无权干涉。

这里有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就是关于“流转”的概念。我国农村土地在私有制时代，土地租赁现象就长期存在。“流转”与“租赁”是什么关系？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把土地承包期延长到15年后，同时做出了自留地、承包地不准买卖、不准出租、不准转作宅基地和其他非农业用地的规定。其他两个“不准”好理解，到现在也是如此。而不准出租，这是当时历史背景下的认识。但实际上，在农村人口流动、分工分业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土地经营权的租赁就具有必然性。但政策规定不准“出租”，因此就逼出了“流转”这个概念。但承包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本质上应该就是承包土地经营权的出租。如今30多年过去了，对“流转”这个概念应当做出清晰的界定，否则容易混淆财产关系，不利于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

（二）关于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除了享有公民权以外，我国农民还享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这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集体土地承包权，二是宅基地使用权，三是集体资产收益分配权。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必须首先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基本性质。依据法律规定，集体经济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因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集体的资产不可分割到个人；二是集体组织成员享有平等权利。从这两个基本特征不难看出，首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不是共有制经济组织。因为法律规定，共有资产可以分割到人，也可以转让共有人持有的资产份额，因此共有制经济的实质是私有经济。有些同志说，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从“共同共有”变成了“按份共有”。这不正确，因为无论“共同共有”还是“按

份共有”，都属于共有制经济，而不是我国农村的集体经济。其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不是公司、企业性质的经济组织。法律关于公司、企业发起、设立的规定完全不同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现实生活中，公司、企业破产、兼并、重组等情形不可避免，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显然不可能发生此类情形。因此，有条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依法设立公司、企业，并依法从事经营活动和承担市场风险。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本身不能改制为公司企业。

此外，在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由于提倡实行“股份合作制”，于是就频频使用“股份”这个概念。但党和国家从来没有讲过要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制为股份制经济组织。因此关于“股”的概念就要讨论清楚。一般意义上的“股”，代表的是资产，持有者有权依法对自己持有的“股”进行处置。但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出现的所谓“股”，其实只是指每个成员在集体资产收益中的具体分配份额，因为集体的资产是不可分割给个人的。对于“股”，农村基层作为约定俗成的口头表达，问题不大。但在制定政策和法律时应当对此有清晰、规范的表述，否则容易混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性质。

（三）关于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东亚地区很多国家的农业经营都以小农形式存在，这是由国情所决定的。习近平总书记 2016 年 4 月 25 日在安徽省小岗村就深化农村改革所作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规模经营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分散的、粗放的农业经营方式难以建成现代农业。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改变分散的、粗放的农业经营方式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需要时间和条件，不可操之过急，很多问题要放在历史大进程中审视，一时看不清的不要急着去动。他说，我多次强调，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农民的土地不要随便动。农民失去土地，如果在城镇待不住，就容易引发大问题。这在历史上是有过深刻教训的。这是大历史，不是一时一刻可以看明白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他在此前还曾强调过：创新农业经营体系，不能忽视了普通农户。要看到的是，经营自家承包耕地的普通农户毕竟仍占大多数，这个情况在相当长时期内还难以根本改变。据第三次农业普查的数据，2016 年，实际耕种的耕地面积为 16.8 亿亩，其中流转面积 3.9 亿亩，占实际耕种面积的 23.4%。由此可见，76.6%的耕地仍然是由承包者自家在经营。

有条件也符合农民意愿的地方，当然应当引导承包耕地的经营权流转、集中、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但农民愿意流转耕地的经营权，前提是要有更好的就业和收入，因此，发展规模经营，与其说是地的问题，不如说是人的问题。鉴于小农户还将长期存在的客观现实，才需要研究如何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问题。这方面各地都有很多好的做法和经验，如兴办合作社，公司加农户，土地托管、代耕，向农户提供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等，要因地制宜地总结和推广成熟的经验。同时还要看到，除了要求土地密集型生产的大宗农产品外，并非所有的农产品生产都需要大规模的土地集中。从我国耕地分布的实际状况看，也并非所有的耕地都适合规模经营，关键是要向小农户的生产提供优良品种、栽培技术、储运营销和其他各种适合于他们的服务。更重要的是，正像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放活土地经营权，推动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要把握好土地经营权流转、集中、规模经营的度，要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与农业科技进步和生产手段改进程度相适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相适应。

总之，小农户迄今为止仍然是我国农业经营的基本面，这不是偏爱小农户，而是客观现实。在发展现代农业的进程中，我们的功夫要更多地用在总书记所讲的创造改变分散、粗放的农业经营的条件上，这样才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八个关键性问题

韩 俊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全局，深刻把握现代化建设规律和城乡关系变化特征，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我国“三农”发展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党中央关于乡村振兴的大政方针已经明确，接下来就是要把这些战略部署落到实处，把宏伟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

一、推动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质量兴农之路，必须深入推进农业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发展，调整优化农业生产布局，推动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

当前，我国农业转型升级已取得明显进展。近年来，各地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着力调整优化农业结构，绿色、生态、优质、安全的农产品生产和供给明显增加。但是应该看到，推动农业全面升级的任务依然艰巨。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我国农产品阶段性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农业供给质量亟待提高。

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要突出两大重点，处理好两个关系。两大重点：一是突出强基固本。粮食安全是战略性问题，必须时刻保持战略清醒。要牢固树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粮食安全观，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严守耕地红线，全面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制度，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要让种粮农民基本收益不受损、种粮积极性不减弱、地方抓粮积极性不放松。二是突出提质增效。落实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制定和实施国家质量兴农战略规划，建立健全质量兴农评价体系、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和考核体系。利用现阶段国内外粮食供需关系相对宽松和库存充裕的窗口期，积极采取粮改饲、粮豆轮作等途径调整种植结构，对市场短缺的品种，努力扩大生产规模。扩大退耕还林还草和休耕轮作范围，加大黑龙江水田休耕、湖南重金属污染地区休耕治理、河北小麦季节性休耕力度，促进粮食供需结构与总量动态平衡。

两个关系：一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坚持市场配置农村资源要素与提高农业支持保护效率相统筹，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与保护农民利益并重，深化农产品价格和收储制度改革，完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在当前生产者补贴、收入保险等一系列配套制度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应稳定制度框架，完善定价机制。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波动情况，适度调整最低收购价水平，加大价格弹性，释放价格能涨能跌的信号。千方百计加快去库存。必须“存量”和“增量”双管齐下，在短期内加快消化现有库存，在长效机制上逐步减少增量。加快实现去库存由计划思维向市场观念转变，注重用经济手段调动地方和企业消化库存的积极性。加快构建新型农业补贴制度和支持政策。稻谷和小麦两大口粮是粮食安全的内核，在合理调整最低收购价水平的同时，按“降多少补多少”原则给予相应补贴，稳定农民收入预期，为分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创造有利条件。同时，与粮食市场化改革方向相契合，积极运用农业保险这一市场化工具，探索推进粮食完全成本和收入保险，加快

构建种粮收入安全网。

二是处理好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关系。当前，我国农业贸易大国地位凸显，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农产品进口国和第二大农产品贸易国。总体看，农产品贸易的发展有效缓解了国内农业资源环境压力，保障了国内供应和市场平稳运行。但另一方面，我国农业贸易大国效应还未充分体现。农业基础竞争力不足，低成本优势逐步削弱。农产品贸易话语权缺失，与农业贸易大国地位不相称。农业“走出去”任重道远，对外投资需要全链条布局。农业海外投资多数主要集中在附加值不高、技术含量低等劳动密集型行业 and 传统领域，没有从战略上建立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和贸易一体化的全球农产品供应链。下一步，我们需要针对“一带一路”建设和地缘政治考虑，完善农业全球战略布局，明确我国利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源的发展方向 and 重点领域，统筹处理与贸易伙伴国关系，兼顾保护国内农业产业安全和农民利益，该进的要主动进，该挡的要坚决挡，该出的要尽力出，最大限度发挥农业贸易在促进农业发展、服务国家对外战略中的作用。

二、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这几年，我们强调发挥适度规模经营引领作用，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这些都是符合现代农业发展方向的。但越是这样越不能忽视小农生产这个基本面。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亩田的小农生产方式，是我国农业发展需要长期面对的现实。处理好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扶持小农生产的关系，是乡村振兴的重大政策问题。要坚持家庭小农生产为基础与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为引领相协调，既要把握发展规模经营是农业现代化必由之路的前进方向，也要认清小规模农业经营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农业基本经营形态的基本国情农情。一方面，要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工程，培育发展家庭农场、合作社、龙头企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实践中，各地通过发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化服务，依托土地股份合作、土地托管、代耕代种等有效形式，在不打破家庭经营格局情况下，实行统种统收、统防统治甚至统销统结，以服务规模化弥补经营细碎化的不足，实现了农业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经营、标准化生产，进而实现了基于社会化服务的节本增效、提质增效、营销增效。这种模式有效解决了亿万普通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问题，要认真总结、不断完善、加快推广。另一方面，必须立足农户家庭经营的基本面，注重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作用，采取普惠性的政策扶持措施，培育各类专业化市场化服务组织，提升小农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改善小农户生产设施条件，提升小农户抗风险能力，扶持小农户拓展增收空间，着力强化服务联结，把小农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

三、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

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落实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

近年来我国乡村绿色发展有了新进展。通过大力推行绿色生产模式，坚决打好农业面源污染攻坚战，农业资源利用的强度下降，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 0.55 以上，退耕还林还草 4240 万亩，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扩大到 1200 万亩；农业面源污染加重的趋势减缓，以垃圾处理、污水治理为重点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全面提速，全国 73.9% 的行政村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但是乡村环境和生态问题仍很突出。资源硬约束日益加剧。人多地少水缺是我国基本国情，耕地质量下降，黑土层变薄、土壤酸化、耕作层变浅等问题凸显，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低 0.2，华北地下水超采严重。环境污染问题突出。工业“三废”和城市生活等外源污染向农业农村扩散，上亿亩耕地不同程度受到重金属污染。农村垃圾、污水处理水平较低。

生态系统退化明显。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仍然有 290 多万平方公里，草原超载过牧问题依然突出，湖泊、湿地面积萎缩，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濒危物种增多。体制机制尚不健全。反映水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机制尚未形成。循环农业发展激励机制不完善，种养业发展不协调。农业生态补偿机制尚不健全。农业污染责任主体不明确，监管机制缺失，污染成本过低。

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要突出四个重点。一是治理农业生态突出问题。大力推行农业清洁生产方式，切实做到该减的减下来，该退的退出来，该治理的治理到位。同时，要对症下药、综合施治，继续加大对水土流失区、地下水漏斗区、土壤重金属污染区的治理力度，分类有序退出超载的边际产能。二是加大农村生态保护和修复力度。把山水林田湖草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系统养护修复的有效措施，包括健全耕地草原森林河湖休养生息制度、进一步完善轮作休耕制度等。要继续把农业节水作为方向性、战略性大事来抓，大规模实施农业节水工程，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加快建立农业合理水价形成机制和节水激励机制。三是建立健全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对于环境污染的治理，不但要坚持不欠“新账”，还应考虑如何逐步还上“旧账”。构建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政策支持体系，让保护环境不吃亏、能得到实实在在利益。四是以更大力度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美丽宜居乡村建设。要整合资源、锁定目标、确定标准，力争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农村脏乱差的面貌得到根本改变，给农民一个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

四、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提升农民精神风貌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要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推动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提升农民精神风貌，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大潮下，农村人口流动性显著增强，乡土社会的血缘性和地缘性逐渐减弱，农村由从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加快演化。一些地方乡村文化特色逐步丧失，传统重义轻利的乡村道德观念侵蚀淡化，人际关系日益功利化，人情社会商品化，维系农村社会秩序的乡村精神逐渐解体，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乡村社会秩序的失范。一些农民社会责任、公德意识淡化，与家人感情日益淡漠，家庭观念不断淡化，导致不养父母、不管子女、不守婚则、不睦邻里等有悖家庭伦理和社会公德的现象增多，家庭的稳定性不断被削弱。封建迷信有所抬头，陈规陋习盛行。一些地方农村红白喜事大操大办，攀比之风和过度消费盛行。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缺乏一套适应农村社会结构特征、符合农民特点的有效方式、办法和载体，隔靴搔痒、流于形式的问题比较突出。

乡村是否振兴，要看农民的精气神旺不旺，看乡风好不好，看人心齐不齐。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三管齐下，采取符合农村特点的有效方式，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和开展移风易俗行动，弘扬乡村文明。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课题。要加强传统村落保护，深入挖掘农村特色文化，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提升展示和宣传。

五、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

乡村振兴离不开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要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让农村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当前，农村经济社会结构正在经历深刻转型。一是农民持续流动。2017 年全国乡村人口比 2010 年减少了 9081 万，比 2000 年减少了 3.127 亿。大量人口向城镇迁移，村庄空心化、农民老龄化程度加剧。青壮年劳动力

外出务工,出现家庭分离,村庄空心化、“三留守”问题严重。二是农民出现分化。原来同质化的农民群体产生了明显的职业分化、收入分化、利益分化,带来农民意愿诉求多元化和行为方式多样化。2016年全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为2.1亿人,比2000年和2010年分别减少1.5亿人和6000多万人。处于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农民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也往往采取不同的利益表达方式,给农村社会发展和乡村治理带来新的挑战。三是农民原子化。市场经济发展激发了农户个体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积极性,同时瓦解了一些传统的经济和社会合作机制,强化了农民个体意识,弱化了农民对村庄生产生活共同体的意识。

面对农村这些正在发生的变化,我国农村社会发展和乡村治理在体制、机制等方面,还存在诸多的不适应,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一是一些地方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现象比较严重。二是基层政府和组织的服务、组织、动员能力弱化。三是农村集体经济薄弱,管理权威和服务能力弱化。四是村民自治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组织农民的难度不断加大。

农村许多社会问题都归结到一个“散”字。农民缺乏组织带动和联结,没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缺少利益纽带、情感纽带、互助纽带。坚持和创新乡村治理,提高农民社会组织化程度至关重要。从面上看,怎么把党支部的核心作用、自治组织的基础作用、集体经济组织和合作组织的纽带作用、其他社会组织的补充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让农民得到各种组织的引导、教育、服务和管理,让农村家家户户联系紧起来、守望相助兴起来、干群关系亲起来,需要认真研究。农村与城市不仅外在形态不一样,社会关系、治理方式也不会完全一样。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就是具有“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的特征。要采取符合农村特点的乡村治理方式,既要注重运用现代治理理念和方式,更要注重发挥农村传统治理资源的作用。比如,近年来,浙江率先探索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在完善自治、加强法治的同时,制定村规民约、行业守则、职业规范等道德章程,设置道德讲堂、德育基地、文化礼堂等各类载体,开展道德评议活动,提升德治水平,促进“三治”相结合,对化解社会矛盾、促进乡村和谐发挥了积极作用。要借鉴浙江等地经验,培育富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新乡贤文化,发挥其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总之,以法治“定纷止争”、以德治“春风化雨”、以自治“消化矛盾”,以党的领导统揽全局,加快形成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三治”结合的治理格局,是乡村走向善治的必由之路。

六、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乡村振兴,农民是主体。必须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把维护农民群众根本利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持续缩小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把乡村建设成为幸福美丽新家园。

看农民钱袋子鼓不鼓是检验农民是否有获得感的重要标志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民收入增速连年快于城镇居民,2017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1.3万元,比2012年增长60.1%。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持续缩小,由2012年的2.88:1缩小到2017年的2.71:1(但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从2013年17037元扩大到2017年的22964元)。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从2012年的37.5%下降到2017年的29.3%。但是受多重因素影响,当前农民增收形势严峻,继续保持较高速增长后劲不足。从农民收入增速看,农民增收已进入“减速带”。从农民收入结构看,由于农业生产成本提升,国际大宗农产品价格低迷,国内稻谷、小麦、玉米最低收购价政策调整,家庭经营性净收入增长乏力。同期,由于国内经济换挡降速,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去产能、去库存、调结构涉及多个行业,农民转移就业空间收窄,工资性收入同步降挡减力。财产性收入在农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不到3%,短期内难以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对此,需要高度重视,要坚持富民为本、富

民为先，结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一步研究优化政策环境，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挖掘乡村价值，大力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千方百计拓展农民增收渠道，确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态势不逆转。

近年来，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虽有明显改善，提高了农民群众的民生保障水平，但现阶段城乡差距大最直观的依然是基础设施差距大，城乡发展不平衡最突出的依然是公共服务不平衡，特别是在社会保障方面短板问题较为突出。下一步，要统筹公共资源在城乡间的均衡配置，建立全民覆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均等服务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对于农村基础设施，不但要加大建设投入力度，还要研究如何完善管护机制，让农村基础设施建得好、护得好、用得久。对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要研究怎样提挡升级，改善服务质量，真正实现从有到好的转变，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从形式上的普惠上升到实质上的公平。继续加大投入力度，推进新增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经费向农村倾斜。以增强公平性和适应流动性为重点，推动社会保障制度城乡统筹并轨，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完善养老体系。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落实好户籍制度改革措施，更好解决随迁子女上学、社保、医疗、住房保障等实际问题，使更多的随迁家庭融入城市生活。要加大对返乡创业农民工的政策扶持，使更多留守人群得到家庭团聚、亲人关爱。同时，建立健全留守人员关爱服务体系，在基本生活保障、教育、就业、卫生健康、心理情感等方面及时为他们提供有效服务。

七、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

长期以来，资金、土地、人才等各种要素单向由农村流入城市、造成农村严重“失血”。当前，城乡之间要素合理流动机制还存在缺陷，无论是进城还是下乡，渠道还没有完全打通，要素还存在不平等交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围绕强化“钱、地、人”等要素的供给，抓住关键环节，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促进公共资源城乡均衡配置，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第一，解决“地”的问题，关键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土地要素城乡平等交换机制，加快释放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红利。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落实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政策，衔接落实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政策，让农民吃上长效“定心丸”。完善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在依法保护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户承包权前提下，平等保护土地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系统总结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经验，尽快把立得住、可复制、能推广的经验变为普遍实行的政策。要按照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的要求，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完善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政策。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不是让城里人到农村买房地，而是吸引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流向农村，使农民闲置住房成为发展乡村旅游、养老、文化、教育等产业的有效载体。要严格实行土地用途管制，不得违法违规买卖宅基地，严格禁止下乡利用农村宅基地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加快破解“农村建设用地自己用不了、用不好”的困局。要更好地盘活存量土地，通过村庄整治、农村空闲、零散建设用地整理等方式节约出来的建设用地，重点支持乡村振兴。要用好增量，调整优化用地规划和布局，将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确定一定比例，用于支持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

第二，解决“钱”的问题，关键是健全投入保障制度，创新投融资机制，加快形成财政优先保障、金融

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要建立健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财政投入保障制度，公共财政更大力度向“三农”倾斜，确保财政投入与乡村振兴目标任务相适应。乡村振兴，单靠各级财政投入远远不够。为此，要支持地方政府发行一般债券、鼓励地方政府试点发行项目融资和收益自平衡的专项债券。下一步，要抓紧制定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制定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考核评估办法。工商资本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要落实和完善融资贷款、配套设施建设补助、税费减免、用地等扶持政策，明确政策边界，保护好农民利益，发挥好工商资本的作用。

长期以来，土地出让收益主要是取之于乡、用之于城，直接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很低。为此，需要创新政策机制，把土地增值收益这块“蛋糕”切出更大一块来用于支持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改进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办法，建立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新增耕地指标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机制，将所得收益通过支出预算全部用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一项很大的政策，用好这项政策，不仅能对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资金支持，而且可起到“一石多鸟”作用。

一是通过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补充的耕地，数量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质量是实实在在的优质耕地。这项政策还可以进一步拓宽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资金来源，有利于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步伐。这几年，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了耕地质量，也增加了耕地数量。据测算，“十二五”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新增耕地率接近4%，“十三五”新增耕地率略有下降，但一些地方新增补充耕地还有一定潜力。比如四川，在满足本省耕地占补平衡前提下，“十三五”期间大概可拿出70万亩指标用于跨省调剂。二是可以有效缓解一些地区耕地占补平衡的压力。目前，一些省份耕地后备资源普遍匮乏，补充耕地质量不高，省域内耕地占补平衡难度很大，迫切要求拓宽补充耕地来源。比如，浙江省全省可用于占补平衡的耕地后备资源仅40多万亩。江苏省可用于占补平衡的耕地后备资源仅90多万亩。三是有利于生态保护。过去把大量开垦未利用地作为补充耕地重要来源，这种方式已难以适应生态建设和保护的要求。

综合多方因素慎重考虑，中央决定在经济发达省份逐步停止未利用地开垦，改进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办法，把这方面的政策机制先建立起来。这样做，可以缓解一些省份耕地占补平衡的压力，可以拓宽乡村振兴筹资渠道，但要加强监管，切实保障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新增的耕地，数量是真实的，质量是可靠的，真正做到“占优补优”。

第三，解决“人”的问题，关键是畅通智力、技术、管理下乡通道。乡村振兴要靠人才、靠资源。要着力在“引”字上做文章，抓好招才引智，促进各路人才“上山下乡”投身乡村振兴。据农业部统计，目前全国返乡下乡双创人员已有700多万人，其中80%以上搞的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如果把城市的人才资源吸引到农村、留在农村，将对乡村振兴产生很大作用。要努力创造条件让农村的产业留住人，让农村的环境留住人。要打破城乡人才资源双向流动的制度藩篱，建立有效激励机制，把有志于农业农村发展的各类人才“引回来”，让城里想为振兴乡村出钱出力的人在农村有位、成就事业，让那些想为家乡做贡献的各界人士能够找到参与乡村建设的渠道和平台，在振兴乡村中大展身手。造就更多服务乡村振兴的人才，要在“育”字上下功夫。进一步整合资金资源，完善培训机制和内容，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全面建立职业农民制度，培养一大批乡村本土人才。要在“用”字上出实招，注重从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退伍军人中选拔充实乡村干部队伍。

八、坚持和完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真正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落到实处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必须切实提高党

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提高新时代党领导农村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提高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大意义的认识,真正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优先位置,把实现乡村振兴作为全党的共同意志、共同行动,做到认识统一、步调一致,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原则体现到各个方面,在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在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确保党在农村工作中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把党管农村工作的要求落到实处,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完善党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机制。建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责任制,实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县委书记要下大力气抓好“三农”工作,当好乡村振兴的“一线总指挥”。要加强各级党委农村工作部门建设,充分发挥其在乡村振兴中决策参谋、调查研究、政策指导、推动落实、督导检查等方面的作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每年要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展情况。建立市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绩考核制度,将考核结果作为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

加强“三农”工作队伍建设。扎实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建立选派第一书记工作长效机制,全面向贫困村、软弱涣散村和集体经济薄弱村党组织派出第一书记。把到农村一线工作锻炼作为培养干部的重要途径,注重提拔使用实绩优秀的干部,形成人才向农村基层一线流动的用人导向。

强化乡村振兴规划引领和法治保障。要科学把握乡村的差异性和发展走势分化特征,要做到规划先行,对于哪些村保留、哪些村整治、哪些村缩减、哪些村做大,都要经过科学论证,做到分类指导、因村制宜、精准施策,彰显地方特色和乡村特点。要防止违背农民意愿,把城市建设的做法照搬照抄到农村,大搞合村并组、撤村并居、集中上楼,打乱传统村庄边界,使村民共同生产、共同生活、共同组织的基础逐渐丧失,造成基层政权、基层组织离农民越来越远,侵蚀村民自治基础。要完善规划体制,通盘考虑城乡发展规划编制,一体设计,多规合一,切实解决规划上城乡脱节的问题。强化乡村振兴法治保障,把行之有效的乡村振兴政策法定化,充分发挥立法在乡村振兴中的保障和推动作用。

(作者:农业农村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8年第4期)

大力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余欣荣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要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新时代农村改革发展

面临的新问题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是推动农业增效、农村繁荣、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一、新时代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具有新内涵新要求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任务，不仅事关农村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而且会在更深层次上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要素流动、产业集聚、市场形态乃至城乡格局产生积极影响，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注入新动能。

从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看，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空间更加广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需要在行业、区域、城乡之间打破原有阻滞障碍，调配好各种资源要素，形成资本、人才、技术、信息等要素顺畅流动、融合发展的新局面。因此，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不能局限于某一个领域、产业或地域，要加快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更好地整合资源要素，实现产业和区域间的优势互补、良性互动。

从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看，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路径更加明晰。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提出了新要求，迫切需要加快农业转型升级，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构建更加完备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实现农业农村经济优质高效发展。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有助于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更好满足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态等方面美好生活的需要，提升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新部署看，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作用更加突出。产业发展是激发乡村活力的基础所在。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有助于激发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创造力、竞争力，改造提升农业农村传统发展动能，加快形成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为产业兴旺提供动力支撑；有助于发挥产业融合发展带来的协同效应，带动更多资源要素进入农业农村，促进生产、生活、生态有机契合，城乡资源要素有机统合，农业多元价值和多重功能有机整合，在更多领域、更大范围、更高水平上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从新时代“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看，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基础更加坚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为我国农村一二三产业更高水平的融合发展提供了支撑和可能。我们必须抓住机遇，力争到2020年我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显著提升，产业链条完整、功能多样、业态丰富、利益联结紧密、产城融合更加协调的新格局基本形成，农业竞争力明显提高，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农村活力显著增强。在此基础上，再通过不懈奋斗，逐步实现更高目标的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基础。

二、新时代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需要新理念新思路

新时代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不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改革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法宝。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有效制度供给，打破要素瓶颈制约和体制机制障碍，在更深层次上推进现代要素集聚和优化配置，

激发融合发展活力。要在更大范围内挖掘资源、生态、文化等多元价值和多重功能，依托区域特色、资源优势、文化差异，因地制宜、优势互补、循序渐进，推进多元化、多样化、特色化融合，培育农村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新时代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必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坚持依靠市场主体、围绕市场需求发展生产，利用市场手段和价格信号，自主选择要素投入规模和水平、产业发展方向和布局、融合发展方式和路径，立足质量兴农、品牌强农战略，不断发挥区域优势、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实现差别化、品牌化发展，提升比较效益、综合效益。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深化农村制度改革、促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着力弥补市场失灵、科学制定发展规划、健全公共政策、优化市场环境，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

坚持以绿色发展为引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要把绿色发展贯穿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各环节、产业兴旺全过程，以绿色发展引领产业融合，节约集约循环利用各类资源，大力发展绿色加工，优化产业布局，推动农产品从种养到初加工、精深加工及副产物利用无害化，鼓励支持农产品加工业与休闲、旅游、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努力构建农村产业绿色发展的生态链、产业链、价值链，使绿色成资源、有价值、可开发、增效益、促增收。

坚持以科技进步为支撑。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在于科技进步和创新。新时代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必须增强数字化思维，用好信息化手段。要高度重视以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技术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为我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创造后发优势。要推进信息技术与生产、加工、流通、管理、服务和消费各环节的技术融合与集成应用，提升技术装备水平，完善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和物流体系，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奠定坚实的信息化基础。

坚持以利益共享为目标。新时代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根本目的是让农民更多分享二三产业增值收益。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把维护好农民群众根本利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基在农业、利在农民、惠在农村”的总要求，以利益共享为目标，构建多样化、多元化、多形式的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利益联结机制，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对欠发达地区，要制订特殊政策引导和支持更多农民加入到产业融合的过程之中，按照让农民付出劳动、创造价值、分享利润的要求，把劳动就业嵌入到全产业链，将家庭经济融入于全产业链，使农民收入体现在全利益链。

三、新时代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有新路径新举措

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针对当前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注重补短板、强弱项、增活力，加快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新进展。

在健全政策体系上下功夫。围绕产业融合发展的目标，加强政策和制度建设，明确政策支持重点，增强政策的系统性、精准性、有效性。特别要围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培育、技术装备水平提升、农业资源保护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方面，创新规划、用地、财税、信贷、保险等政策制度，加大支持力度。着力打造产业融合发展平台，依托粮食生产功能区、现代农业产业园等“三区三园一体”平台，推进政策衔接，整合项目资源，推动农产品全产业链发展。

在夯实产业基础上下功夫。拓展农业多重功能，提升技术、信息、管理等要素催化能力，充分挖掘农业

农村资源的价值优势，推动农业与休闲旅游、饮食民俗、文化遗产、教育体验、健康养生等产业的嫁接融合。以市县为单位，因地制宜，因产制宜，积极引导产城、产镇融合，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着力推进技术集成、要素集聚、企业集中，打造领军型产业融合发展企业，带动产业链前延后伸，发挥产业融合引领作用。大力促进产业有机对接，做优做绿第一产业，做实做强第二产业，做精做活第三产业，推动产业技术融合、功能融合、价值融合，促进产业纵向融合、横向融合、交叉融合。

在强化智力支撑上下功夫。大力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支持鼓励农民工返乡、能人下乡创业创新，积极引导科技人才、管理人才参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升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着力促进技术集成应用，不断提升融合发展技术装备水平，探索和推广信息技术与生产、加工、流通、管理、服务和消费各环节的技术融合与集成应用模式。积极创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结方式，推动科企社对接、银企社对接，发挥优势、强强联合，增强示范带动能力，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通过就业带动、保底分红、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健全利益联结机制，推动小农户融入产业融合链条。

在打造质量品牌上下功夫。实施质量兴农战略，制定和实施国家质量兴农战略规划，建立健全质量兴农评价体系、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和考核体系。优化产业布局，以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为引领，推进农业标准化、规范化生产，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为全链条全环节绿色融合发展奠定基础。打造区域公共品牌，结合绿色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打造一批国家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全国知名企业品牌、大宗农产品品牌和特色农产品品牌。

在完善公共服务上下功夫。积极打造服务平台，依托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集聚区、优势区和实力主体，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组建研发、开发中心等，打造一批标准高、服务优、作用强的公共服务平台。切实提高服务水平，培养引进专业服务管理人才，高质量开展政策咨询、政务宣传、区域品牌推广、农产品市场与价格信息提供、人才推介、质量监管等公共服务。充分发挥孵化功能，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密切合作，在技术、人才、标准开发上用力，加大项目资金支持力度，健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服务体系。

（作者：农业农村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北京造林绿化工程的真正意义在哪里

任荣荣

一、最基本的指导思路

最近从 2017 年 4 月 27 日《中国绿色时报》版看到，从 2018 年开始，北京要实施 100 万亩的造林绿化工程，邀请了一些院士、专家献言献策。因为我曾经担任北京市沙产业协会会长有几届时间，对北京造林绿化有些认识，作为首都的北京，造林绿化意义重大！可是重大意义的核心理论是什么？令人困惑。几十年来，

北京的造林绿化一直都处在困惑中，在行政指挥下进行。按理讲，作为首都，人才济济，北京造林绿化的应当成为全国的楷模。年年植树造林绿化，客观地统计一下实施面积，应当是现有造林绿化面积的数倍以上（其实全国也一样）。这说明什么？还不够“成熟”。还不能成为全国的楷模。还要进一步展开百家争鸣、集思广益。本人不揣浅陋，发表一些拙见，供决策者思考。动物（包括人类）、树木、草类是地球上绝对不可或缺的灵性之物，也是修复、培育地球拥有高级灵气的基础。

空气中有灵气、土壤中有灵气、水体中有灵气，统称天地灵气。灵气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有相应的物质组成。因为有许多许多的物质，仅人们的肉眼是看不见的。大自然界中的奥秘，以人类现有的科学知识去认知，仍然是非常肤浅的。有些物质、人类的认知度恐怕不到6%。比如讲，一片桑叶究竟含有多少种物质，日本科学家测算估计有一万多种，而现代科学水平只能说近200种，认知度几乎只占2%，还有98%的物质不知道，这些物质的功能、作用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桑叶是药食同源的食物，无毒无害。这是几千年来的实践证明了的。古人的认知度肯定更低，但是很聪明，便称桑叶为神仙叶。一个“神”字说到了要点处；所以古人云：天地灵气充溢便有“天材地宝、物华天宝”。还有一句成语叫“人杰地灵”。虽然神乎，但却指出了规律。所以在因果关系上来讲我们植树、种草，造林绿化大方向是对的，符合大自然的发展、发育规律，利用天地存在的灵气，培育动物、植物，形成天材地宝、物华天宝。但达到这个目标还需满足人杰和地灵两个要素。

所谓灵气就是风调雨顺的大环境下空气是纯洁的，含有大量的负氧离子和对动物植物生长发育有益的多种元素气质（包括许许多多不明物质）。至于不利于动植物繁衍生长的有毒气体物质必须十分稀少，甚至没有。除了空气还有水、土壤中的正能量物质，三者合一，则谓该区之天地灵气。体现灵气的最高外形模式就是本区典型的原生态的森林植物地理景观模式。比如北京地区的森林植物地理景观模式就是含有针叶树种的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其树木、植物、动物种类，就是以今天认定的乡土动植物种是长达几千年的天地灵气滋养下形成的。如前所述，我们现有的科学认识还很肤浅，大自然奥秘很多很多，我们还未认识到，主观上的自作聪明举措往往可能是愚蠢的、任性的，甚至是反自然科学规律的。近百年来，特别是1958年大炼钢铁肆意砍伐森林，1961年前后的毁林开荒运动，导致全国的天地灵气急剧下降，至今而未能恢复，有些地方看来已是绿水青山，但其存在的天地灵气是低级的，或为初级的。低级的和初级的天地灵气养育的所谓天材地宝其实也是低级的。北京地区无论是山地丘陵还是平原湖沼，总体上讲天地灵气是下降的，所以北京地区也缺少天材地宝。随便举个例子，北京应是暖温带水果的原产地，果品质量应当富集天地灵气而为上乘产品。但是不管如何使用现代技术改良，如今的果品都远远不及解放初期的质量。水果是如此，农产品亦是如此。70岁以上的人深有体会。为什么？天少灵气，地缺灵气，水更缺灵气！植物、动物是天地灵气滋养的性灵之物，由于缺少天地灵气或不接地灵之气，抗逆性普遍下降，畜禽全要依赖于农药、兽药维持基本健康。于是品质下降，有的干脆就成了问题食品。人是万物之灵，由于缺少天地灵气，免疫力也普遍下降。过去有天材地宝补养，保持身体健康。现在则是医药卫生防疫部门越来越多，而人们的免疫系统能力仍在下降，各种病痛层出不穷！

综上所述，北京新一轮的100亩造林工程首先要有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大力恢复培植天地灵气，为天材地宝的形成打好永久的基础。否则就会重复流入形式主义的怪圈之中。我们一定要使北京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合二为一的养生之地和天材地宝的资源库。

二、精心做好规划、解决几大问题、做好几件大事

造林绿化要使北京成为人杰地灵、物华天宝、充满天地灵气的森林城市；为首都人民的大健康奠定可靠的养生和工作的福地；成为天材地宝的可永续利用的生态经济资源库。这些目标当是首都人民的共同心愿，一旦实现这一目标，那将是划时代的顶级境地。所以还要做好以下一系列大事。

1. 造林绿化问题往往出在规划设计上。缺少前瞻性、全局性的科学远见。便会有“规划规划墙上挂挂，大家看看，大风一吹，稀里哗啦”的顺口溜出现。一个区县的造林绿化规划设计书翻来覆去变，在几十年内不知道变了多少次。所以造林绿化也就跟着变来变去，年年有将前期的造林绿化工程推倒重来，也就不稀罕了。几十年来的教训实在太多了。

2. 北京属于暖温带地区，又在“西风环流”的活动区域内，年降水量较少，人均水资源严重不足，国家不得不搞南水北调。所以防风固沙，节约用水仍然是造林绿化必须认真对待的大事。这次又是 100 万亩的造林绿化任务，在树种选择上和防风固沙问题上，当以生态效益放在头等地位来统筹考虑。平原地区防护林体系必须进一步完善！在居民集中的村落和小镇，过去着重于种大树。而抗逆性很强的灌丛植物则很少，造成地面毛糙度不足，所以在冬天平地起沙、扬沙情况严重。还有，具有吸盘的藤本植物亦欠缺，房屋建筑立体墙面绿化更待努力改善。这是提高城镇居民地区天地灵气的不可或缺的工程。

3. 北京山地、丘陵森林植被较好，由于历史原因，天地灵气含量在上升，但大部分还是初级灵气，林中所产的“天材地宝”质量也不能和历史相比，亦属初级。适当种植增加部分历史上有名气的“天材地宝”类植物是必要的。比如传统的药材种植之地，由于灵气不足，药材质量就不能和过去相比，为什么灵气欠缺。

4. 从“天地灵气”的形成规律看看，目前最差的就是平原地区和城镇地区。地下地上的天地灵气消耗殆尽。历史上充满灵气的土壤社会已基本崩溃，有些甚至成了有毒物质的重要载体，形成了毒地和死煞之地。蚯蚓等软体动物是评定土壤有否灵气的重要指标。土壤所含的腐殖质则是标志土壤微生物的生死攸关的指标。北京平原地区，过去是北京的农业生产基地，这里的土壤几十年来备受农药、化肥的摧残，土壤腐殖质来源断链，残留的农药、有毒物质集聚在土壤表层，特别是一些水稻产区，尤为严重。本区植树造林绿化最大的现实意义就是要以尽快修复改善土壤社会的灵气为重要职责。要把北京郊区的养殖场的动物和居民的排泄物从污染环境转化有益环境的有机肥料还进土壤，增加土壤的腐殖质和有机肥。把林、农、牧业的良性生态循环链恢复和改善起来。中国的农耕文明所以历史悠久，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遵循了“第一生产者（植物）、第一消费者（动物）、第一分解者（微生物）”三者之间良性的生态循环规律。保证了天地灵气数千年的充盈状态。北京是缺水之城，如何把居民的用水变为再生水，用于植树造林绿化所需之水，都要加以创新。人要和自然和谐，人、山、水、林、田、湖、草要成为生命共同体，才能提升北京地区的天地灵气，其中林业首先要和社会融合，林业要从生命共同体出发，将共同体的融合职责首先担当起来。北京市人民政府的领导，协调作用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所以恢复天地灵气生产天材地宝还要依靠四个字叫做“人杰地灵”。唯有人杰地灵才有北京人的大健康环境。才有生产天材地宝的生物资源库。

（作者：中国林科院教授、重庆海田林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再论践行“三农”必须强、富、美

——学习十九大精神启示

李毓堂

[前言]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农民占国人半数以上，农村（牧区林区）占国土绝大部分。因而，十九大报告全篇都关系“三农”问题。十九大精神启示我们：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农”必须强富美方略，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达到农业现代化，保障全面进小康和实现中国发展二个百年目标的历史使命。

（一）新时代“三农”问题的新定位

依据十九大对目前国情社情党情的形势分析和提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两个百年发展目标的任务，“三农”问题在新时代改革发展中的地位越加重要：

1. 它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主要方面；
2. 它是城乡发展和收入差距问题的主体；
3. 它是社会矛盾和问题叠加的重点；
4. 它是党和国家长期想解决而尚未解决的问题；
5. 它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
6. 它是全面达小康建强国七大发展新战略的关键；
7. 它是国家“四化”发展中的短板和优先发展取项；
8. 它是建成科技强国、美丽中国、全民共同富裕社会，实现“两个百年”发展目标的保障；
9. 它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二）“三农”必须强富美是新时代从根本上全面解决“三农”问题的科学方略

“三农”问题是相互关联、因果互动的统一体。农业不强则农民不会富农村不会美，农民不富则农业不会强农村不会美，农村不美则农业不会强农民不会富。农业已超出自身范围成为社会化大生产。

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农”必须强、富、美方略，其重大战略意义在于：

1. 它抓住了化解新时代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2. 它指明了农业现代化的务实目标，是实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行动纲领；
3. 它是破解城乡发展和收入差距、社会矛盾与问题叠加的钥匙；
4. 它是实施达小康建强国七大发展战略的关键环节；
5. 它是实现国家发展两个百年目标的保障；
6. 它把关系国计民生根本性问题、全党重中之重的工作，真正落到了实处。

（三）“三农”必须强、富、美的历史节点使命，当前制约因素与战略对策

关于农业必须强

节点与使命：

农业必须强（生产方式和生产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是稳固国民经济基础，保障国人饭碗衣装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实现全面达小康和中华伟大复兴历史节点的必然要求，是新时代必须完成的使命。

问题与对策：

1. 科技创新与普及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两翼。当前制约农业走强的基本因素是绿色高新科技（含传统绿色科技）未能在农业生产中全面普及，以致农业化学污染、资源浪费、成本增高，效益下降，产品质量不保，进口量增加甚至价格倒挂等问题总体严重。战略对策应是创造条件全面普及绿色高新技术，促进农业转型升级。这是“科技强农”战略举措。

2. 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当前制约农业走强的主要因素是个体分散小块土地作业、人财物力薄弱的经营方式，不适应绿色科技推广普及需要具备大规模地域空间和大量资金、物力人力投入的条件。

邓小平在论及农业经营体制改革时曾预见，第二次飞跃改革的时机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需要，发展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现在正当其时。这是“集体强农”战略举措。

3. 农业走强必须增强自身扩大再生产能力。目前制约我国农业走强的关键因素是农业仍处于生产初级产品的第一产业阶段，注定产值不高。而农畜产品经加工、销售（二、三产业）运作，如稻麦变为上市高档食品、牛奶变为高档乳制品、棉毛皮张变为纯棉毛料皮装、果蔬肉类变为超市罐头等等，产生几倍增长的产值效益，却不能为农民获得用于技术改造和扩大再生产。

钱学森在本世纪初基于对国情、社情、与实践的研究，曾上书中央领导，建言在发展知识密集农业型新兴产业时，一开始就搞产业化，实现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一二三产业相结合。这正是农业走强的关键，是“三产强农”战略举措。

关于农民必须富

节点与使命：

农民必须富（至少达到城市人均收入水平）是保障科技强农和新农村建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扩大内需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实现共建共享共同富裕社会历史节点的必然要求，是新时代必须完成的使命。

问题与对策：

1. 科技兴农增收。目前制约农民致富的基本因素是农业未能普及绿色科技，生产力低，收入少。战略对策是从全面普及绿色科技入手，提高农业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即“科技致富”战略举措。

2. 规模经营集体致富。当前制约农民致富的主要因素是在国情人均地少的条件下，农民个体分散无力达到生产致富。战略对策应是农民组织起来发展规模经营的集体经济，走“一个都不能少”的共同富裕之路。这是“集体致富”战略举措。

3. 延长产业链增值致富。目前制约农民致富的关键因素是农业处于第一产业阶段，农民难以获得加工、销售几倍增值的效益收入。战略对策是农民发展三产一体化新型产业，达到增收致富。这是“三产致富”战略举措。

关于农村必须美

节点与使命：

农村必须美（实现绿水青山的优美水土生态环境、现代装备的美好生活、科教文卫完备乡风文明的智美人文）是达到国土生态文明、社会文明，缩小城乡差距，实现美丽中国历史节点的必然要求，是新时代必须完成的使命。

问题与对策：

1. 科技美村。目前制约农村达美的基本因素是农业化学和生活垃圾等造成的面源污染。战略对策是普及绿色科技，建立起资源综合利用、物质能量循环、变废为宝生态优化的绿色生产生活体系。这是“科技美村”战略举措。

2. 集体治理。当前制约农村达美的主要因素是农户分散，难以对山水林田湖草统筹规划治理。战略对策是发展集体经济组织，实施“集体美村”战略举措。

3. 增强动能。目前制约农村达美的关键因素是农民缺乏自建实力。战略对策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三产一体化新兴产业，通过几倍地增值效应，增强自主建设动能。这是“三产美村”战略举措。

综上所述，要达到“三农”必须强富美，就要实施科技强农富民美村、集体强农富民美村、三产强农富民美村三大战略举措，全面建立起绿色科技农业生产体系，规模经营的新型集体经营体系。三产一体化大农业产业体系，三者相辅相承，达到系统集成。这正是十九大提出构建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的创新体现。

（四）实施“三农”强富美方略中需重点关注处理的几个问题

1. 发展新型集体经济需同巩固完善家庭承包制衔接，达到“两个飞跃”优势结合。

按照十九大关于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壮大集体经济的精神，在完善土地三权分置，保持农户土地承包权长久不变的基础上，农户可通过土地（承包权）入股方式加入集体经济，成为股东。

集体经济在发展三产一体化大产业中，必然会将一部分农户分流于加工、商贸生产领域，这就使一线的农户有条件完善适度规模的联产承包。

农户从集体经济发展中可获得土地股酬、承包劳动报酬和工商利润返还分红等多项分配收入。

2. 在全面推广普及绿色科技中要关注各项技术间的相互配套集成。

农牧业生产中的水、肥、土、种、植、保、机、管（农业“八字宪法”）和水、草、繁、改、管、防、舍、机（牧业“八字宪法”）及信息，数字等各项技术，是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矛盾统一系统。各项技术又是由内部许多因素构成的小系统。而农业生产、加工、商贸一体化更是由诸多高层次因素组成的复杂巨系统。因而在绿色科技普及实施中，既要发挥各单项技术的优势，又要关注各项技术间的相互配套，达到系统优化集成。孤立地推行单一技术，很难起到全局效应。这正是钱学森指出的，发展农业型知识密集产业要研究

农业系统工程。

3. 按照十九大关于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精神，农村发展三产一体化集体经济要同社会已有农工、农商专营企业建立既有公平竞争又可合作双赢的关系。把集体经济土地、劳力优势和工商企业的技术、经验优势结合起来。

4. 在“三农”发展建设资金筹集和使用方式上，应采取有偿为主，无偿为辅的方式。

“三农”强富美是农民为主体的事业，要发挥农民自主自强精神和造血动能，由集体经济采用集资入股、银行贷款、吸收社会有偿投资等方式筹集资金。

国家和社会主义举支农的无偿资金，在使用上可采取两种方式：一部分可无偿用于支农队伍工作、调研、示范、培训及奖励等活动；一部分可变为有偿资金用于集体经济发展建设，定时回收后循环使用。

5. “三农”科技人才队伍的培育宜采取多管齐下方式。

当前农村科技人才缺乏甚至外流的主要原因是农村缺乏繁荣兴旺前景远大的创业舞台。实施“三农”强富美战略开辟了创业创新的广阔天地，将吸引全国有志科技人才向农村聚集。

加强正规院校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重在培养爱农务实创新科技人才。

要特别重视在生产实践中，结合实际培训农民。通过“干什么学什么”短期多次培训的方式，使农民尽快掌握实用技术，逐步形成技能型劳动大军。

在“三农”创新过程中，发现、选拔、深造、培育青年才俊，建立起新一代“三农”战略人才、领军人才和高科技人才队伍。

[结语] 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农业、农民、农村必须强、富、美方略，实施科技强农富民美村、集体强农富民美村，三产强农富民美村三大战略举措，是包含工程技术科学、管理科学、社会经济学、人文科学等在内的复杂巨系统工程。这正是钱学森所预见：由现代生物工程为主包括信息、机械、水利等新技术革命推动，以发展农业型知识密集、三产一体化五大新兴产业（农、林、草、沙、海）为内容的，人类历史上第六次产业革命。这一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伟大复兴中必将获得成功。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
2. 邓小平：《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355页
3. 钱学森：《迎接第六次产业革命建立农业型知识密集产业》（1984年12月）《关于西部大开发致江泽民总书记的信》（2000年3月）（载李毓堂编著：《钱学森知识密集型草产业及第六次产业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农业出版社，2014年9月）
4. 李毓堂：《试论践行“三农”必须强、富、美》，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通讯》2017年第8期

（作者：现任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专委会名誉主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所特聘专家，原农业部农业政策研究会研究员，牧区办主任。国务院京津周围绿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主笔起草国家首部草原法，创立草产业系统工程（草畜工贸）理论与基本模式，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务院颁发农业技术突出贡献证书及政府特殊津贴。出版《钱学森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与实践》等专著多部。本世纪以来专注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研究）

各方对孙万鹏著灰熵学（灰学）的评议

吴文上

◎钱学森 我国著名科学家：

“灰学”是一门新学科，在美国就有 MIT 的 Forrester, Denais Meadows, peter Senge, 还有 Sante Fe Institute 等，所以是一门大有前途的理论。

◎刘云山 十八届政治局常委，在任中宣部领导时说：

“孙万鹏同志，你不生病，也可能与我们一样，干一个副部长、部长；但在我国省长、部长多得很，灰学创始人只有你一个。”

◎钱永健 2008 年度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钱学森侄子：

“谢谢您与我分享对‘老子’的诠释。”

◎邓聚龙 世界灰色系统理论创始人，原华中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

“孙万鹏先生在学术上是知识渊博，才华横溢的《灰学》创始人；孙先生在品格上是为了事业，为了祖国，奋击拼搏的楷模”。“孙先生的书，我拜读得比较早，看后，我很惊奇，我觉得作者真是个人才，不管是从问题的高度层次，从书的内涵，从作者的知识丰富的程度和对问题的剖析的程度，都不是一般的，是大手笔”。

◎董光壁 中国科学院著名自然科学史专家：

孙万鹏先生的大作《第三种科学》别开生面，在深入思考四百年科学思想发展史的基础上，运用辩证法正、反、合的逻辑，提出未来科学思想的走向——我想“五个一”工程若能奖励孙先生这部力作，历史将证明是正确的。

◎丘亮辉 国际易学联合会荣誉会长、《太湖书院》“智库”总顾问：

孙先生的《第三种科学》一书，我读后很感兴趣，觉得写的很好。它是一种新的概念，一种创新，一个发展，是大跨度的科学新分类。实际上，是第一种科学与第二种科学的继承与发展。第三种科学的产生，不是凭空出来的，其产生是必然的，孙先生的考察研究，令人信服。孙先生的《灰熵学》，可谓是宏论大作，蔚为壮观，中道特色，利国利民！

◎刘锡荣 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中纪委副书记：

多次来我家看望患病中的孙万鹏，关心灰理论的研究。当他看到我们总是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两个儿子没有工作，感叹地说：“根据您的情况，两个儿子安排一个工作，还是可以的”。老孙总是以郑板桥的话作答：让他们：“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业自己干。靠天靠人靠祖宗，不算是好汉”。

◎顾锡东 时任浙江省文联主席：

欣然为孙万鹏《灰学》首发式题词：拜读华章亦快哉，崭新领域豁然开。素知生命常青树，理论而今始信灰。

◎高明光 时任中宣部出版局局长：

孙万鹏不是“经院式”的学者，而是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学者，其灰学著作不仅对理论界同志有理论上启发，而对各个领域都会有重要价值。

◎史开泉 灰色系统研究所所长、教授：

孙先生的书很有功底。有邓聚龙的书，侧重于用数学语言讲话；有孙先生的书，侧重于用哲理语言讲话；灰理论就完整了。

◎朱祖祥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水稻所所长：

朱院士在《灰学》首发式上发言，热情称赞孙万鹏在病中研究灰学说：这种精神非常可贵！非常值得学习！我看了他的著作，感到很精彩。我为今天能有 26 个省市代表来参会，祝贺灰学首发，感到很高兴。

◎铁 瑛 时任中顾委委员、原浙江省委书记：

对全国灰理论研讨会暨孙万鹏所著《表现学》《灰色价值学》等公开发行业表示祝贺！并对孙万鹏抱病著书立说的可贵精神表示赞赏。

◎刘 枫 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

我对孙万鹏与病魔抗争的顽强精神表示钦佩！愿灰理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陈 冰 时任天津市政协主席、原浙江省委宣传部长：

陈冰紧握孙万鹏的手，希望战胜癌魔与创建灰学取得“双成功”！

在场的大会秘书处人员激动地说：这次全国灰理论研讨会暨孙万鹏灰学著作首发式，比刚结束的浙江大学“校庆”，还要热烈隆重！

◎罗庆成 时任浙江省农学会灰研会理事长、教授：

我感到，孙先生是一位多“T”型的人才，是个奇才。孙先生的著作是令人回味的佳作和边缘学科，每一个学科都涉及到了，是多学科交界的地方长出的启发之作。

孙先生的阅历很深，知识面很广，而且，灵感也很丰富。

◎刘志澄 中国农科院原副院长，时任中国农学会常务副会长：

孙万鹏著的《灰农学》从短点与非短点的动态过程来看问题，变“一方先于一方”介入型为协调发展，这一点非常重要。为解决当前和今后农业问题有重要意义。

◎杨巍然 中国地质大学副校长、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副院长、教授：

“灰学”是一门很有前途的学科，就地质科学来说，就是地道的灰色系统，我对孙先生的理论十分崇敬、佩服，的确很了不起。

◎李荫森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教授：

孙万鹏创立灰学、发展灰学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我认为，创建一门新学科，一门新型的思维科学，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刘宏昌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编辑，市场报副总编辑：

灰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大有发展前途！孙万鹏作为灰学创始人，思想理论之大家，做了一件前无古人，惠经千秋的事业。

我更赞赏孙的严谨治学态度。在引用古今中外名人名著时，都标明来源出处，一丝不苟，虚怀若谷。

◎柳 斌 时任国家教委常委副主任、国家总督学：

在孙万鹏灰学文集北京新闻发布会后，柳斌告诉他儿子，要认真学习孙万鹏灰学理论。他带着儿子见孙万鹏时说：“孙老师与我是在中央党校学习时的同班同学，而他（孙）是学得最好的”。

◎吕子东 量子宇宙学与中微子研究专家：

支配 20 世纪科学界的哲学思想，由于“灰学”的出现和兴起，也就是“第三种哲学”或“第三种文化”的兴起而受到普遍性的冲击。如众所知，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过程是由信息的确定部分和不确定部分共同构筑的，因此人类所能表达的自然界只能是“灰的”。由此，以往所谓的基本公理都须接受新的检验。

◎解 安 时任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

尊敬的孙万鹏老师与夫人，二位前辈好！收到孙老新作《周游 50 国》一灰学创始人孙万鹏眼中的世界，甚是兴奋！很是敬佩前辈精神！

◎王凤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国务院特殊津贴：

前几年，我看了孙先生提出的第三种科学和第三种医学理论，对我研究养生保健有着极大的指导意义。今年（2017）我已经 95 岁，日前，我连续几天，看了孙先生著作《灰学札记——“社会热点”的灰学评述》，使我浮想联翩，满脑子《灰熵学》，思考了许多问题，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深受启发，广受教意。

◎廉绵第 《浅谈东西方文化发展》的著名学者：

《灰熵学》是中国哲学家孙万鹏先生提出来的。他是从自然界、社会界普遍存在的第三种现象概括出来的“第三极理论”，在哲学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巩光临 九三学社独立学者：

可喜的是，现今所有新思维哲学具有指导意义的专著中，中国学者孙万鹏先生的《灰谐论——人体系统科学新思维》可谓独占鳌头，他提出“第三医学”的概念，将“博大精深”的远古文化与现今以至未来的哲学理念合而为一，是自然科学与人文哲学融合一体的崭新概念。

◎韩民青 时任山东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孙万鹏先生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是文化的精神。提倡和发扬这种精神是中国文化重新崛起、重新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孙先生是中国学者的杰出代表，孙先生的治学精神值得钦佩。

◎张湘琴 时任中国农大人文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认为，孙万鹏的《第三种科学》是一部重头的《灰学》理论著作，从古今中外思维方式、认识论、方法论的演进看，渊源深远，不断发展。在工、农、社会经济、军事和国防、文化教育、体育、卫生防疫、环保诸多方面，都取得了很多成效。的确是一部言之有物，持之有据，成为一家之言的很不简单的新理论。

◎沈亨理 时任中国生态经济副理事长、中国区域生态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先生的广博知识，我佩服极了。我是研究宏观横向的，可以研究很多方面的问题；我夫人是中国科学院研究员研究微观横向的，也可研究很多东西。我俩结合起来研究孙先生的书，感到孙先生的书，实际上是一种给人们提供了研究规律的武器。极具特色，很难得。人们要有成就，以我看，离不开第三种科学。

◎杨直民 时任中国农大农业科技史研究员：

孙先生《第三种科学》观点的提出，是学术上一个重要的进展。科学，分类问题，苏联的海洛夫专门搞分类的，他搞了一辈子。孙先生从第一种科学、第二种科学、第三种科学来分类，我认为是站在前沿的。往前突破了。

◎毛士艺 时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认为，孙先生提出的新观点是一个火花，要使火花燎原，要渗透到许多科学领域，用它来发现一些新的规律，给以新的说明。孙先生用新的科学思想来指导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郑 重 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农业部副部长：

孙万鹏同志确实有一种超人的意志，坚持的毅力来从事灰学的研究。我觉得科学的发展能在国际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不容易，是需要做很多的工作，国家应给予支持。

◎王伟光 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我对孙万鹏同志的为人和做学问的崇高精神表示钦佩，我认为孙万鹏同志顽强战病魔，潜心搞研究，身体力行，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模范与典范，值得我们大家学习，我希望孙万鹏的《灰学》理论及其精神，都能在全国范围得到推广，发扬并光大。

◎何 康 中国农业部原部长，联合国国际粮农组织粮食奖获得者：

从孙万鹏夫妇游考世界七大洲五大洋 56 个国家，发回来的论文看，在真实性、趣味性和启发性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郑梦熊 人民日报社原副社长、副总编，时任中国记协党组书记：

孙万鹏同志的《灰学》理论，研究方向明确，定位合理，在方法论的研究上成绩卓著，创建的灰学思维方式，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我向孙万鹏同志的成功表示热烈祝贺。

◎张象枢 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环境经济研究所所长、政策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经济社会系统研究中心主任：

孙万鹏从灰学、从控制论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突破。从控制来讲，有可控性与不可控性，但更普遍的是孙先生讲的第三种。当然，用邓聚龙的一套描述也可以，但是，有限制。哈肯的协同论提出“自组织”、“它组织”，实际上，绝对“自组织”与“它组织”也是特例，它有孙先生讲的更普遍的第三状态。我觉得孙先生这一步跨越是很重要的。

◎吴义生 时任中央党校教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常务理事、编辑出版委员会主任：

从简单性科学（还原论）转变成复杂性科学，需要处理的是大量的复杂巨系统、非线性现象和“灰色”问题。孙万鹏在上述课题的研究上迈出了一大步，对人类科学和哲学事业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向社会奉献了许多科学性、理论性强的好著作，开辟了新途径，开拓了新领域，这是值得我们重视和肯定的。

◎殷登祥 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美国《科技和社会通报》国际编委：

孙万鹏先生利用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辩证方法，在掌握丰富材料的基础上，凭藉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高超的思维能力，概括出历史上先后相继的三种科学。其理论意义在于：它是灰学领域内的重大成果；是一种新的科学分类观；是贯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一种新的思维方法；其实践意义在于：它给人们提供的这种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新方法、新思路，将对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有重要意义。

◎徐立幼 时任浙江大学教授、省政协委员：

我对孙先生的为人与经历比较了解，他的精神一直在鼓励着我前进。他的“不患位之不尊，但患德之不崇”的精神，非常感人。被黄岩人民称为焦裕禄式的好干部。

◎顾益康 时任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

孙万鹏是我的“恩师”。他的灰学思想方法，不同于一般科学和经济理论，它是可以覆盖整个世界的高

层次学说，它是运用哲学的思想，文学的语言，数学的方法构筑的新理论。它给我们认识、解释客观世界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

◎张友仁 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美国传记研究院顾问、剑桥国际传记中心荣誉顾问：

据了解，孙万鹏的灰学理论是从黄岩得到启发，萌芽于黄岩。这使我想起原北京大学马寅初校长的《新人口论》，也是在黄岩作经济调查时受到启发，收集材料，最后写出来的。

◎黄志镗 时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我祝贺孙万鹏创立了灰学。凡灰学举办的研讨会，我都会争取参加学习。

◎周拥军 时任世界汉诗协会会长：

对于孙万鹏先生的灰文化思想我们大为赞赏，对于孙先生将灰学思想在诗歌上的应用，而且有如此巨大成绩，我们十分敬佩。相信灰学诗歌现象必将会形成一种新的诗歌表达方式，对汉诗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我要衷心地感谢孙老师，我永远的朋友和师长。

◎张同吾 时任中国诗歌学会秘书长、国际华文诗人笔会秘书长：

我感到孙先生所开创的灰学理论是在寻找、寻觅、开拓在清晰与模糊之间，在有限与无限之间，在有形与无形之间，在已知与未知之间的这样一个更广阔的疆域，而这个疆域是人类思维、人类认知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认知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一个非常宽广的热点地。

◎刘济民 国务院原副秘书长：

孙万鹏同志本来是学植保专业的，多年从事农村工作。他从农学领域到哲学领域，又到文学领域，又进入人的生命科学领域，在不同学科、不同领域，都有不平凡的业绩，创造了奇迹，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不断地创造奇迹呢？我看是万鹏同志几十年来所修炼的那种精神的力量。我们从万鹏同志身上，看到了一个人一旦拥有那种伟大的精神，能飞多么高，能走多么远，能攀登什么样的科学高峰，能发掘出多么巨大的潜能！这种精神，集中到万鹏同志身上，就是大彻大悟大智大勇大毅力大品德。拥有孙万鹏同志那样的伟大精神，必定创造奇迹。

◎郭书田 农业部政策体改法规司原司长，全国三十位著名经济学家之一，时任《通讯》月刊总编：

孙万鹏的学术成就是了不起的：一是来源于孜孜不倦地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文献，形成一个宏大的学术思想库，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当前的实际提炼和升华出来的，具有渊博而厚实文化功底与丰富的知识积累，体现了继承性、批判性、选择性的科学精神。二是来源于大量的实践，包括本人的直接实践与他人的间接实践，体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思想。特别是近几年来走访了全球各大洲，考察了经济、社会、文化等发展的实际，获得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为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营养源。三是来源于他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精神，体现了研究工作中的科学思维。四是来源于他的刻苦钻研、求真务实和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体现了理论密切结合实际的良好学风。五是来源于将自然科学重视实验的研究方法运用到社会科学里重视实证并把二者密切结合起来融为一体。体现了严谨的整体的科学态度。六是来源于良好的文风，体现了“言之有据、言之有物、言之有理”一丝不苟的严肃作风。

（作者：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送：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 有关部委司局、各省农委（农业厅）、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各研究所
发：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各处、室、中心及下设机构

总 顾 问：刘 坚 卢继传

副 主 编：辛 梅

网 址：www.zhongguanyuan.com.cn

电 话：010-59195015 59195293

010-66117652 57206299

地 址：农业部北办公区 16 号楼、18 号楼

部门协助：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推广培训处

主 编：胡兆荣

责任编辑：孙正恩

邮 编：100125

邮 箱：zgynjs@163.com

moagov@163.com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南 3 楼、4 楼

责 任 人：黄维东

